

# 恩 福

## BLESSINGS

V.11 N.4 總41 2011/10

天國好像一粒芥菜種，有人拿去種在田裡；這原是百種裡最小的，等到長起來，卻比各樣的菜都大，且成了樹，天上的飛鳥來宿在它的枝上。（馬太福音13:31-32）

### 生根基督 展枝四海：從懷念斯托德談起 P. 2

Rooted in Christ, Stretching out to All Nations:  
Remembering a Radical Disciple John Stott

### 從“神道設教”看“政教分離” P. 5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in China: A View Based On  
the Tradition of “Divine-way” Religion Instituted by the State

### 一個呼喚“父親”的年代 P. 10

A Generation Crying out for “Fatherhood”

### 學術界的挑戰和機會 P. 28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the Chinese Academia

## 徵集圖片

為了增加與讀者的互動，本刊徵集圖片，刊登於封面與封二。圖片需與本刊主旨相關，並請提供相應經文。一經採用，有微薄稿酬以示鼓勵。

攝影：劉建慰



“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

(詩篇119:105)



攝影：劉建慰

“盼望不至於羞愧；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

(羅馬書5:5)



# 目錄 Contents

## 時代話題 *Current Issues*

- 生根基督 展枝四海——從懷念斯托德談起 2  
 Rooted in Christ, Stretching out to All Nations:  
 Remembering a Radical Disciple John Stott 編輯室
- 從“神道設教”看“政教分離” 5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in China: A View  
 Based On the Tradition of “Divine-Way” Religion  
 Instituted by the State 李 靈
- 福啊！延伸！ 封底  
 Extension of the Blessings of the Gospel 蘇 卿

## 新視野 *New Perspectives*

- 一個呼喚“父親”的年代 10  
 A Generation Crying out for “Fatherhood” 張路加
- 發現靈魂之旅（三）——“我思故我在” 13  
 A Journey of Discovering the Soul (III):  
 “I think, therefore I am” 周小安
- 日光之下無新事：有神進化論、初期教會、  
 諾斯底主義的回潮（中） 17  
 Nothing New Under the Sun: Theistic  
 Evolution, the Early Church, and the Return of  
 Gnosticism (2) 唐理明譯

## 恩福

2011年10月 第十一卷第四期 總41  
 出版者：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701 S. Atlantic Blvd., Suite 268B  
 Monterey Park, CA 91754, U.S.A.  
 Tel. (626) 308-3530 /Fax. (626) 308-3534  
 e-mail: theblessingsf@yahoo.com  
 Website: www.bf21.org

會長／主編 陳宗清  
 執行編輯 劉良淑  
 美編 周 珊  
 編輯 劉建慰  
 特約編輯 黃瑞怡  
 行政 林雪騰  
 編輯委員 王忠欣、李 靈、莊祖鯤、陳俊偉、  
 陳惠琬、陳愛光、張路加、遠志明、  
 蔡茂堂、劉同蘇、謝文郁  
 （按筆劃順序）

本刊自由索閱，建議奉獻：\$15（一年四期）  
 索閱單請影印本期 27 頁  
 奉獻支票請開：BCMF

本刊有作者署名之文章，文責作者自負，立場不代表本刊。  
 本刊保留文章版權，歡迎轉載，請先來信通知。

- 天地有多寬 巧合知多少？ 20  
 How Many Coincidences in This  
 Immeasurable Universe? 吳家望

## 藝文天地 *On Arts*

- 武俠與信仰對話新篇章：評介《入武林、  
 覓真心》 23  
 The Dialogue between the Chinese Martial Arts  
 Story and Faith: A Review of *Exploring Martial Arts,  
 Searching for Sincere Hearts* 黃瑞怡

## 報導與見證 *Events & Testimony*

- 第11屆恩福家人退修會特別報導  
*Special Report: the 11th Retreat of the Blessings Family*
- 深思又深情 25  
 Deep Thoughts and Deep Affections 劉良淑
- 學術界的挑戰和機會 28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the Chinese Academia 謝文郁
- 從憤世到獻身 31  
 From Resentment to Dedication 葛 浩

**Blessings**, Vol. 11, No 4, Oct., 2011

President/Chief Editor: Grant Chen

Managing Editor: Liang-Shwu Chen

Art Designer: Shan Zhou

Editor: Jeffrey Liu

Associate Editor: Jui-Yi Huang

Published quarterly by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ISSN# 1543-0936**

### 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BCFM

**異象** 推動文化宣教 耕耘華人心田

**信仰** 本使團篤信聖經為真神啓示，原稿毫無錯誤，是信仰與生活最高的準則，並接受早期教會信經以及近日福音派的信仰告白。

**董事** 陳愛光（主席）、張文幸（書記）、許榮惠（財務）、駱傑雄、蕭隆昌、蘇文峰、陳宗清、陳永昌、陳俊偉、陳惠琬、陳 政

**Our Vision:** Ploughing the Field of Chinese Culture  
 Preparing Hearts for the Gospel

**Our Confession:**

We accept the Bible as the inerrant revelation of God, guiding faith and living. We also accept the creeds of the early churches and the evangelical confessions.

台北代理：致福感恩文教基金會 吳淑萍 T:8780-1011\*201

澳洲代理：Philip Shaw 邵海東 T:2-9341-5367

倫敦代理：Joseph Tam 譚健生 M:7952 882746

香港代理：朱偉健傳道 T:2508-0568

新加坡代理：章顯中 T:65-9370-9096



# 生根基督 展枝四海

## ——從懷念斯托德談起

編輯室

享壽90歲、2011年7月27日辭世的斯托德牧師，是位深深紮根於基督的神僕。他於2010年出版的封筆之作，《徹底的門徒》（*The Radical Disciple: Some Neglected Aspects of Our Calling*），用源於拉丁文「根」的字（radical）來定名，說明信徒必須生根於基督，並委身作門徒，以基督為效法的宗師。

他提到，門徒的頭一個特色就是「不妥協」，不向周圍的文化妥協。書中論及當下四種潮流的挑戰：多元主義、物質主義、倫理相對主義、自我中心主義。斯托德老牧師懇切勸勉讀者，不要隨波逐流，而要像基督謙卑捨己（道成肉身）、服事、愛人、恆久忍耐、完成使命。

這些最終的肺腑之言，無疑是斯托德牧師畢生事奉的寫照。從17歲決定委身基督開始，「釘十架的基督」始終是他注目的焦點。

### 作門徒而非教徒

出生於1921年的斯托德，成長於歐洲自由派興盛、放棄聖經為絕對真理的時代。英國雖以基督教為國教，但是嚴肅對待信仰、承認聖經是神啓示的人並不多，在知識分子當中更少；他身為醫生的父

親即是位不可知論者。儘管虔誠的母親和管家將他從小就帶到教會，但對兒時的他而言，宗教不過是一種習俗與傳統。

讀中學時，他在一次聚會中聽到拿施牧師（Eric Nash）提出一個問題：「那稱為基督的耶穌，我怎麼辦他呢？」（馬太福音27:22）這句當年彼拉多問群眾的話，在斯托德心中縈繞不去，讓他不得不面對耶穌被釘十架、又復活的事實。當晚，他在房間獨自慎重禱告，決定委身於這位救主。

中學期間，由於校園事工掌舵者拿施牧師等人悉心的帶領，他建立起靈修與研經的好習慣。天資聰穎加上自律，他大學的成績名列前茅，且充分展現語言天份；他又熱心參加團契，與志同道合的朋友相互切磋。這批跟隨耶穌的學子不以福音為恥，積極領人認識基督。當時的學府流行自由派思想，高舉理性，貶抑聖經，但他們卻認定神的話即是真理，一方面認真研讀聖經，一方面不輕忽理性的功用，探索如何按照聖經來面對問題，以致能夠不畏譏諷，放膽高舉基督。斯托德深入剖析聖經的出眾恩賜，從大學時期已經開始磨鍊。

他最早的名聲是善於佈道。甫在萬靈教會（All Souls Church）全職服事，他就積極教導會眾如

斯托德認為，教會應當發展出逆流而上的基督文化，有與眾不同的目標、價值觀、標準、模式。John Stott claimed that the church should develop a Christian counter-culture to go against current trends with distinctive purposes, values, standards, and models.



何領人信主，寫了《平信徒如何在教區傳福音》（*Parochial Evangelism by the Laity*, 1952）一書。他也曾是英國大學團契最受歡迎的佈道講員，信息集成《基督教要義》

（*Basic Christianity*, 1958）一書，暢銷多年，譯成25種語言。而《獨排眾議的基督》（*Christ: the Controversialist*, 1970）一書更反映出當年斯托德引導福音派知識分子抗衡自由派潮流的努力。

斯托德畢生著書超過五十本，他的思路清晰，辯證有力，讓人信服。他深信，智力是神的禮物，曾特地寫《別埋沒你的頭腦》（*Your Mind Matters*, 1973），闡述心智的重要；而他窮盡智慧考察聖經，展示其中的能力，塑造全方位的人生。

他最感滿意的一本書，就是《基督的十字架》（*The Cross of Christ*, 1986）。福音派珍惜的核心，就是耶穌基督的一生和其工作，並聖經為其所作的見證，而斯托德的書充分展現，這寶貴的信息足能贏得全世界。在他的帶領下，英國福音派從挨打防守、死氣沈沈的狀態，變成朝氣十足、往前衝刺的運動。

## 投身社會而非潔身自好

斯托德一生住在同一個社區，終生未婚。自幼年時就參加萬靈教會，畢生沒有離開。1945年由聖公會按牧，在該教會任助理牧師。1950年，方29歲的他即在這間飽受戰爭瘡痍的教會接任主任牧師。

在他初擔牧職時，西方福音派信徒大多只看重如何維護信仰。一方面是因為基要信仰數十年來不斷受到自由派的攻擊，停留於固步自封的心態；另一方面是由於當時倡導社會關懷的人，往往屬於自由派，所以保守的信徒不願插手社會問題，以免被掛上「社會福音」的招牌。但經過二次大戰對歐洲的破壞後，人們對自由主義的樂觀產生懷疑。

內斂冷靜、外表溫文的斯托德，其實有見義勇為的個性，15歲時就曾發起「給遊民洗熱水澡」

的活動。成為牧師後，他看出福音派陷入只顧敬虔的狹隘；面對問題叢生的社會，他知道聖經明示，神的子民應當作鹽作光，負起改變世界的使命。因此，斯托德在講台上頻頻鼓勵信徒，要投身世界。其實在歷史上，英國的虔誠信徒曾經有美好的榜樣。救世軍是在倫敦成立，以嚴謹的紀律為貧民服務；在國會為廢除奴隸制奮鬥數十年的威伯福斯和克拉朋聯盟，更是家喻戶曉。

斯托德認為，教會應當發展出逆流而上的基督文化（*Christian counter-culture*），有與眾不同的目標、價值觀、標準、模式，踏踏實實去生活，和當今的科技潮流分道揚鑣，摒棄各種捆綁、物質主義、自我中心和貪婪。這樣的教會必然流露喜樂、順服，充滿愛心、自由，不單討神喜悅，還會吸引世界。當教會表現出應有的教會樣式，靠著聖靈活出超然之愛的生命，世人才會相信。

## 放眼全地留芳後世

斯托德於1960年代到拉丁美洲、非洲、亞洲旅行，前所未見的貧困百姓深深打動了他。於是他重新檢討，發現耶穌基督的工作，是傳道和醫治扶弱同時並行。自此，他改變了以往所持「傳福音第一，關懷第二」的觀點。

1974年，在佈道家葛培理牧師（*Billy Graham*）的號召下，全世界福音派領袖一千多人聚集在瑞士的洛桑，參加世界福音會議，其中來自中南美洲和非洲的牧者幾乎佔了一半。與會者對於向全球傳福音的異象無不同心認可，但對傳福音與社會關懷的關係卻意見紛紜。斯托德在開會演說中指出：「大使命（註：指馬太福音28:18-20）並沒有對大命令（註：指約翰福音13:34-35）作出解釋、限定範圍、或超乎其上。」

在起草第一屆洛桑宣言的委員會中，他發揮外交技巧，促進溝通，不斷修改，逐字潤稿，使得最後完成的使命宣言得到絕大部分與會者熱情的背書。洛桑會議成為全球福音化的重要里程碑，而斯托德是使其團結的靈魂人物。1974到1981年間，他擔任洛桑神學與教育委員會主席，對於福音派對傳福音和社會行動相互



倫敦萬靈教會

在二十世紀神使用斯托德，在普世振興了篤信基督和聖經的福音派教會，但願祂在二十一世紀也施恩給華人教會，興起同樣忠心的門徒。  
 May God raise faithful disciples in the Chinese churches in the 21st century just as He has used Rev. John Stott in the 20th century to revive the Christ-centered and Bible-believing Evangelical churches around the world.

關係的瞭解貢獻卓著。

1982年，他協助成立了「倫敦當代基督教研究中心」(London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Christianity)，專門探討各種嚴峻的社會問題。他畢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C型觀點》(Issues Facing Christians Today, 1984初版, 2006四版)，剴切剖析面對當代全世界的重大問題，基督徒的立場與回應為何，如墮胎、兩性之間、企業關係、人權、生物科技、核武、氣候變遷等。



斯托德從年輕時委身作門徒，終生不渝。

由於關懷全世界的窮人，他從1983到1997年擔任「淚水基金」(Tearfund)的主席。他也察覺栽培福音派新興領袖的重要性。1971年，他用自己的版稅收入設立「福音派文字信托」，贈送書籍給牧者、教師、神學生。1974年開始設立「靈風信托」獎學金，資助第三世界(斯托德稱之為「多數世界」)福音派學者進修博士，後來這兩者合併成為「靈風國際事工」(Langham Partnership International)，擴及各大洲，延續迄今。

斯托德很早就看出多數世界中教會的活力與潛力。他卸下萬靈教會主任牧師的職務後，便將大量時間投入其中。他旅行各國，見過成千的教會領袖，鼓勵那些尋找自己角色的年輕弟兄姊妹，示範解經講道，活出謙卑簡樸的榜樣。因著各地教會領袖千百人與他為友，不少文化鴻溝得以架起橋樑。

有一次他和一位拉丁美洲神學家一同到阿根廷訪問，適逢大雨，街道泥濘。第二天一早，這位神學家醒來時聽到刷鞋的聲音，他驚訝地發現，斯托德牧師正在刷他的鞋。斯托德說：「耶穌要我們彼此洗腳。你不需要我洗腳，但我可以替你刷鞋。」

在得知斯托德過世之後，紐約時報著名記者克里斯多夫(Nicholas Kristof)，在假期中特地為報社趕寫一篇專欄：「斯托德與福音派基督徒」。這位經常前往全球最傷心、殘酷的地方，報導重大災情的記者說，他常常碰到福音派信徒，他們「去到最前線，無論在國內或國外；極力協助淪入饑餓、癩疾、監獄強暴、強制墮胎、人口買賣、滅族殺戮的人；好些最勇敢的人士是福音派基督徒(或保守的天主教徒，他們的行徑也類似)，就是真正活出信仰的人。」

克里斯多夫很佩服這些人：「我自己

不怎麼虔誠，但是看見這些人甘願如此冒險犧牲，讓我相當震驚。」而克里斯多夫在文中指出，斯托德乃是福音派最具榜樣的領袖。

## 真實見證的感動力

2003年有位學生問斯托德牧師「如何向後現代的人傳福音」，他回答說：「我自己深信，在後現代的時代，福音的呈現不在於我們說什麼，而在於我們怎樣生活。基督徒的生命裡必須有一種無法否認的真實，我們所說的和我們的為人不能是兩回事；我們私下和公開的生活也不能是兩回事。我們說什麼，就是什麼。這就是真實。別人要在我們裡面看見基督，而不只是聽我們講。」

誠如這番話，斯托德本人毫不掩飾地活著。在《徹底的門徒》中，他坦白分享自己於2006年跌斷髖骨時，身心軟弱的經歷。素來情感內斂的他，手術後無力自理，情感也難以自持，數度流下淚來。他回顧說：「這種完全『脫軌』的經歷，是突然發生的，使人震驚，難以接受。沒有辦法用理性來解釋，對男人尤其如此——似乎非常沒有尊嚴。但是一旦誠實以對，卻可以成為極大的釋放。把它視為神所賜的經歷、祂所給予特別的禮物，預備我們去面對未來的改變，這種時刻就顯得很有價值。」

《今日基督教》2011年9月紀念這位神僕的文章，結語說：「斯托德是表裡如一、敬虔謙卑的基督徒。他正直無偽，毫不裝扮。這就是普通、平凡基督徒的特色。不是人人都做得到，但斯托德做到了。」

斯托德所處的英國上層文化，既講求外表素養，又高傲自視。然而因著生根基督，斯托德的一生超越了周邊的文化污濁，吐露屬天生命的清新芳香；不僅如此，他也展枝四海，藉著以他為師為友的千萬人，將基督的芬芳傳遍各地。

其實，華人的「面子文化」，和千年不改、近日愈發明顯的「中國中心」觀，與斯托德所處的大英帝國文化情境不相上下。在二十世紀，神使用斯托德，讓篤信基督和聖經的福音派教會在普世振興起來，但願祂在二十一世紀也施恩給華人教會，興起同樣忠心的門徒，甩脫虛偽的束縛，勝過文化的潮流，鍾情基督，高舉神言，熟諳真理，體恤眾人，關懷全地。這樣的人必能具備屬靈的真知灼見，有力地傳講從神而來的信息，撼動神的子民，激發行善與傳福音的熱誠。

願神憐憫，興起一代又一代如斯之忠僕，不僅在華人教會，亦在普世教會。



# 從“神道設教” 看“政教分離”

李靈

**木**擾中國政府近三十年的宗教問題，這兩年因為北京守望教會斷斷續續出現在露天聚會，又引發了全社會的關注。可喜的是，“問題”正引導人們對“宗教”作更深入的思考；反映在學術界，則集中在如何處理“政治和宗教的關係”。

中國的宗教問題，說到底就是“政教關係”問題。“教”，在漢語中既是指宗教，也可以指各種思想、觀念體系、甚至倫理道德，亦即所謂“三教九流”；而“政”則既是“政治”也是“政府（政權）”。釐清這些詞語，才可能清晰表達中外在用法上的區別。

## “政教分離”之來龍去脈

任何一個具有宗教傳統的國家，“政教關係”是必須面對、且不得不處理的棘手問題。目前學術界比較一致認為，“政教分離”是最佳措施。

在以基督教為傳統的國家中，政教關係處理得最好的，當數美國。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為“權利法案”的一部份，禁止制定任何法律以“確立國教”、阻礙信仰自由、剝奪言論自由、侵犯出版自由和集會自由、干涉或禁止人民向政府和平請願的自由。<sup>1</sup>該法案於1789年9月25日提交給各州批准，並於1791年12月15日獲得通過。原本只適用於聯邦政府和國會制定的相關法律；因為當第一修正案獲得通過時，一些州已經建立了官方教會，有些一直持續到19世紀早期。

在1947年的“艾弗森訴教育委員會案”（*Everson v. Board of Education*）之後，州政府也被納入該條款的限制範圍。然而直到20世紀中晚期，通過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確立國教條款”和“自由信仰條款”的司法解釋，才禁止了各州官

方對宗教的推廣活動。在1994年的“齊亞斯·喬伊爾村學區教育委員會訴格魯梅特案”（*Board of Education of Kiryas Joel Village School District v. Grumet*）中，大衛·蘇特大法官代表多數派意見寫下判詞，說：“政府不能相對於一個宗教而喜歡另一個宗教，或者相對於無神論而更喜歡宗教。”至此，“第一修正案”便在全美普遍有效，無一州例外。

然而這判詞並沒有突顯“政教分離”的含義，因此“確立國教條款”成了美國不同團體之間爭論不休的話題。自由主義者一般根據美國第三任總統湯瑪斯·傑弗遜在1802年元月回復康奈迪克特州丹伯瑞浸信會會友（*Danbury Baptists Association*）的私人信件，作為解釋的依據。1801年10月7日，這些浸信會會友寫信給傑弗遜，表達他們擔憂聯邦政府日後會對宗教活動橫加干預。傑弗遜在1802年元月回信，如此許諾：“我懷著對主權的崇敬，認真思考您所擔憂的問題後，鄭重地向全體美國

人民宣佈：他們的立法機關不會產生任何法律去特別推崇某一宗教，或禁止任何宗教自由的行為，因此，要在教會和國家之間建造一堵使兩者分離的牆。”自由主義者便據此闡述，“確立國教條款”的精神實質是“政教分離”。<sup>2</sup>

保守主義者也同意這樣的解釋，只是他們認為，國家和教會之間的這堵“牆”，只是反對確立一個國教，而並非反對政府承認“神”的存在，或反對政府可以參與宗教活動。一些比較激進的保守主義者，甚至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報告指出，大部份美國人認同後者的觀點，甚至67%的美國人據此推定，美國是一個“基督教國家”。<sup>3</sup>

儘管“政教分離”並沒出現在“第一修正案”中，但因著它而確立了“政教分離”的原則，則是



西方人……實行的是“教會和國家分離”。至於個人的宗教信仰和個人的政治立場、訴求，卻是無法分離的。  
The Western nations adopt the policy called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However, it is impossible to separate a person’s political stance and aspirations from his faith.

無可置疑的了。

## 西方“政教分離”的演進

西方經歷了從“神權政治”到“政教分裂”的歷史。西元392年，羅馬皇帝狄奧多西一世頒布命令，廢除舊有宗教，關閉一切氏族神廟，禁止一切異教活動，只有基督教才是唯一合法的宗教。此後，羅馬成了政教合一的國家。

教會權勢進入巔峰，是1198到1216年教宗依諾森三世（Innocent III）時代。他對教宗制度懷有崇高理想，不但要管理教會，並要得到當權皇帝的尊重。他在位期間，基督教世界中大部分君王都是羅馬教會的封侯，教廷權勢無與倫比。整個十三世紀，從依諾森三世到尼法修八世（Boniface VIII），教宗都握有屬世的權威，掌控著基督教各國。

但到了尼法修八世（1294-1303），教宗的權勢卻開始快速衰敗。起因是尼法修八世與法國國王腓力（Philip the Fair）的衝突。法王向國內的聖職人員課征重稅，而教宗禁止聖職人員繳稅；法王為了報復，便禁止金、銀、寶石出口，使教宗的歲入受到影響；教宗因而發佈幾道諭令，開除法王的教籍。而此時因十字軍屢次東征，貴族的權勢和財富消耗殆盡；失去權勢的貴族產生了強烈的民族意識。因百姓支持國王，使法王腓力更有力量與教宗抗衡。由此拉開了“政教分裂”的序幕。

此後的歷史主旋律，便是世俗政權不斷挑戰教宗神權、民族國家不斷挑戰羅馬教廷。馬丁路德宗教改革後，民族國家紛紛脫離羅馬教廷的統治，世俗政權也不斷與宗教神權分道揚鑣。1598年4月13日，法國國王亨利四世在南特主教堂簽署了“南特敕令”，承認了法國國內兩格諾教徒（新教徒）的信仰自由，在法律上享有和公民同等的權利。這是近代史上第一份有關宗教寬容的敕令。儘管後來亨利四世之孫路易十四在1685年頒佈“楓丹白露敕令”，宣佈廢除“南特敕令”，再次將基督新教定為非法，但是“南特敕令”所開創的宗教寬容，已成了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

這個潮流直接影響了歐洲大陸的社會歷史發展。在英國，洛克撰《論宗教寬容》一文，闡述了“宗教寬容”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奠定了國家在立法時不干預宗教的基礎。他指出：立法權應以社

會的世俗利益和外部繁榮為宗旨，而不是考慮靈魂永生的層面。政府若要去干預人們如何從上帝獲得永生，結果反而更糟。“所謂服從，首先是要服從上帝，其次才是服從法律。”<sup>1</sup> 這便是所謂“洛克式的政教分離”。表面看來，洛克是將法律置於上帝之下（自然法之下），但是這種“有限政府”反而獲得了比中世紀更大的權力，成為更加獨立的民族國家。



神權與俗權不斷分離，“宗教信仰自由”隨同生命、財產權力的自由一同寫進法律，成為基本人權的主要內容。宗教退出政治權力，進入私人生活領域，與中世紀的“行會”一起構成了與“國家”相對應的“社會”；而“教會”成了傳統基督教國家（特別是新教國家）凝聚信徒的基本單位，也是相對於“國家”的最強社會力量。

美國的歷史是從“社會”開始立契約，形成“州政府”，進而組成“聯邦國家”，所以在“教會”和“國家”之間就存在著某種“張力”。如何處理“教會”和“國家”之間的關係，涉及千千萬萬個人的信仰權力，也關乎國家的權威及安危。所以無論是“洛克式的政教分離”，還是“傑弗遜式的政教分離”，其實質都是將社會所存在的兩大勢力做合法的區隔，但並不是將作為“信仰”的宗教和作為“理念”的政治進行區隔。這是西方基督教國家經歷過慘痛的歷史教訓後，逐漸領悟的“共識”。

因此，提倡“政教分離”的美國總統、議員們等，依然大談個人的信仰，甚至還干涉別國的信仰問題。在西方人看來，軍隊、法律、員警等，是“國家”而不是“政治”，選舉、政黨等則屬於“政治”，而不是“國家”。他們實行的是“教會和國家分離”。至於個人的宗教信仰和個人的政治立場、訴求，卻是無法分離的。

## “政教分離”之中文困境

中國沒有類似的歷史經歷，也沒有同樣的社會結構，因而難以從自己的現實狀況中形成西方式的“共識”。

中國的歷史進程完全不同於西方。就近現代的發展來看，中西最大的差異就是：中國沒有發展出“社會”。儘管過去有以宗祠為核心的自然村落組織，但卻是以家族為主體，且各自為政，互不往



中國和西方在社會歷史上主要的不同點，就是“政”和“教”的關係。在中國，並沒有一個獨立於“政”之外的“教”。 In respect to the social structure, the major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histories li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religion. In China there hasn't been such a thing that any religion can be independent from the state.

來，完全沒有社會共同體之共性。

此外，中國始終沒有產生類似“行會”這樣工商性的組織。西方教會是建立在共同的信仰之上，而“行會”則是在信仰和生產相同產品的雙重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使同業同行在產品的品質、定價等方面，能有規範體系。在歐洲，“行會”先於“教會”獨立於國家之外。這兩者都突破了家族的局限，成為社會共同體。

但中國歷史上沒有出現過“行會”或“教會”。國家歷來面對的挑戰是“強大的家族”，而幾乎沒有遇到過任何強大的“社會組織”。迄今為止，中國還是只有“國”和“家”（開了門是“國”，關了門就是“家”），其間並沒有社會組織存在。國人沿襲幾千年的皇權專制思想，對“政治”的潛意識就是：一切與政權有關的思想和行為。而對於“宗教”，則根本不會從“社會勢力（組織）”的視野來看，只從“信仰”的角度去理解。因此，許多國人無法理解，為什麼“國家”要與“宗教”切割。



天道與人道互為“表像”。通過這種表像，不但可以對幽微的天道和人道有所體認，而且可以將無形之道化為有形之文，達到教化的目的。可見，人文是“以道化俗”的途徑。

所謂“人文化成”，在春秋戰國之前，是通過以祭祀為主的禮儀制度實現。《左傳》成公十三年：“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宗廟之祀、兵戎之祭，被看作武功文教的頭等大事。《禮記·祭統》說：“凡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

由此可見，中國和西方在社會歷史上主要的不同點，就是“政”和“教”的關係。在中國，並沒有一個獨立於“政”之外的“教”。而“政”本身一定意義上是為“教”而行使權力，也即按照“自然之道（天道）”為原則，來對人“施教”，教化使其成為人。是故，“神道設教”是努力使“人道”合乎“天道”的過程。而在這個過程中，“祭祀”是最主要的環節：“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sup>9</sup>

## “神道設教”的涵義

中國幾千年的漫長歷史，沒有出現神權政治，和能與國家相抗衡的宗教力量，這也許與“神道設教”指導下的“政教關係”互為因果。

“神道設教”的提法，出自《周易》的觀卦彖辭：

“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盥”是敬酒灌地以降神的儀式，祭禮以此為盛；<sup>5</sup>“薦”則是向神位獻饗豆等物的小禮儀。<sup>6</sup>按彖辭作者的理解，百姓看到國王在宗廟祭祖中舉行“盥”的隆重典禮，便會對神道產生敬信。<sup>7</sup>宗廟祭祖符合天之神道，使四季沒有差錯。聖人於是根據神道制立法教，使天下百姓服膺，達到有序的治化。“神道”即是“天之神道”（“天道”），指四季循環等自然秩序。聖人制立敬天祭祖的禮儀，將天之神道彰顯出來，<sup>8</sup>意義在於實現人道教化。

稍後的賁卦彖辭說：“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與人文對舉，顯示

“祭”是古禮，居五種禮儀之首。祭祖作為一種宗教活動，在禮儀文化的大系統中發揮著重大作用，是因祭禮與政教、風俗渾然一體。照歐陽修的说法，三代以前的社會，禮樂與政教法規都寓於風俗民情之中；因民情而成風俗，因風俗而形成自然的禮儀節文和法規。所以禮樂政教雖然簡單，卻能達到高度的和諧大治。<sup>10</sup>

這樣的政治體制，既不是“神權政治”，也很難說是“政教合一”。原因就在於，此“教”並不是西方辭彙中的“宗教”，更非類似基督教的“一神教”。從社會功能意義上看，這“教”也確實發揮著西方“宗教”的社會作用——強化族群認同、提供道德資源、體現終極關懷等；但從形態學意義上看，它確實是無神的，或泛神化的。按照這個基本特性，本人主張將傳統的“神道設教”中之“教”，看作是“無神宗教”（本文恕不深究此概念）。

在功能的意義上，這“教”解決了中國社會對“宗教”的需求，而且還達到兩個統一：“政（治）”和“（宗）教”的統一，信仰和倫理的統一。這兩個統一杜絕了社會上出現另一（宗）教的可能，因而也杜絕了出現能與國家相抗衡的（

中國政府目前的宗教政策，確實仍沿著“神道設教”的習慣思維。  
At present the Chinese religious policy has employed the traditional thought of “Divine-way religion instituted by the state.”

宗)教勢力。同時，這樣的社會現象又進一步強化了“神道設教”的理念。這種互為因果的歷史進程，孕育出與西方完全不同的中國社會形態。

## “神道設教”與政治權術

至此，人們定然會質疑：為什麼在漢以後歷次的農民起義，都採用了宗教性的密謀組織，幾乎無一例外？如東漢的“黃巾起義”，就是假借“五斗米道”，凝聚了數萬農民。這是因為，秦始皇統一天下，在當時的中國缺乏“合法性”的精神來源。他依賴武力、強行統一的結果，導致以後的中國政治越來越關注權力。因此，政治的最高價值是權力意識，而不是政治意識。恰如學者趙汀陽所說：“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

可以說，中華帝國首先放棄了天下體系，從世界政治轉向國家政治，再放棄後者，而變成國家行政：即帝王為了防止最高權力被質疑、挑戰，建立起一種能夠瓦解任何政治集團凝聚力的制度，創造一種屬於皇權、全然服從的組織，以控制整個社會——就是官僚體系。如此，政治變成統治，從而終結了政治。所以，“中華帝國的統治，根本是一種反政治或者說無政治的統治。”<sup>11</sup>



漢武帝開始推行“獨尊儒術”，來增強“合法性”和國家的凝聚力。但是這種“儒術”以服務“統治”為目的，不以“民生”為根本；再加上儒家思想經“意識形態”化的過程後，過於理性化，缺乏整合全體民族的基礎。所以，漢以後的廣大民衆一直在尋找精神資源，以求安身立命。道家思想迅速宗教化，以及佛教進

入中國，其根本原因都在於此。

而每當社會進入重大危機時，底層的民衆便會以傳統宗教——特別是道教——作為凝聚民衆、抗衡朝廷的精神力量。遺憾的是，每次改朝換代結束後，登上權力寶座的統治者又繼續強化權力意識，而不是政治意識。朝廷對於社會上以宗教凝聚起來的“勢力”格外忌諱和敏感。為了鞏固統治，一方面利用日益龐大的官僚體系來扼殺和剿滅，一方面就將流行於民間的“異端”整合到官方的意識形態中，為朝廷“教化”民衆所用。

在中國，“神道設教”便從“政治”轉變成

為“權術”，而延續下來。

## “神道設教”或“政教分離”？

目前在中國，“國家”是實體，而宗教組織早已被虛化了。由此而言，是否還有必要按西方的宗教傳統和民族國家歷史的意義，在“國家”和“宗教組織”兩者之間去建造“一堵牆”？

但是，“政教分離”這堵“牆”，已經成為“現代國家”的一個重要的標誌，即“國家”不干涉社會和個人的宗教活動（精神生活）；反之，社會和個人不得以宗教名義干預國家的權威和治理。這一點恰好既不同於中國“神道設教”的傳統，也與“馬列主義意識形態”主導的現實國家完全相左。

其實，中國政府目前的宗教政策，確實仍沿著“神道設教”的習慣思維。比如，政府一貫要求所有宗教都要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有利於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有利於建設和諧社會等等。這就是要將廣大民衆所信奉的宗教納入主流的意識形態框架之內，成為主流意識形態“教化”民衆的輔助。迄今為止，這個“傳統”還繼續順著慣性在運作。

當前中國基督教的情況是：“三自系統”教會已經被納入政府體制，至於“家庭教會”，曹志先生作了貼切的描述：

“由於神學建設和教育的缺乏或稚嫩，城市家庭教會帶領人的神學觀，更多受其性格特徵、專業知識結構及思維模式影響。所以，一方面，儘管堅持不加入三自的立場，家庭教會仍因中國傳統文化型塑之世界觀的影響，將六十年前因信仰原因不加入‘三自’的家庭教會中的‘家庭’空間固化，理解成私下隱蔽聚會的場所，認為這仍是目前教會存在和發展的最佳模式。我將這種教會稱為‘宅教會’。該類教會極易培育將信仰與外界疏離甚至隔離的信徒，我稱之為‘宅信徒’。

另一方面，在民主運動的艱苦延續和維權運動興起的風潮下，部分基督徒將福音廣傳與民主（憲政）國的建立，簡單徑直對接；將權貴集團與民間社會的關係，直接等同於靈界力量的對立；以國家與社會間關係的政治學思維，來觀察和判斷政府與家庭教會的關係。儘管這類基督徒組成的家庭教會不多，但對教會內民主人士和法律人頗具吸引力；借助維權、民間外交和國際媒體的結合，在公民社會和國際社會有一定的影響力。城市家庭教會置於二者之間，思維及行為更多受‘宅教會’模式影

只要還是共產黨執“政”，“教”就必然還是由“馬列意識形態”主導，“政教”就不可能“分離”。  
As long as the state is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Communists, "religion" would definitely be led by Marxism-Leninism. There will be no separation of religion and state.

響。”<sup>12</sup>

這種狀況下的中國教會，雖然無法與當年傑弗遜總統面對的美國教會相比，但並不是說，就沒有必要在中國建立“政教分離”的一堵牆。

守望教會從預備註冊、購堂、到參加“洛桑大會”，一系列的舉止顯示，這教會不僅不願意被納入“體制內（三自）”，而且也不甘心成為“宅教會”，與世隔絕，同時也不願因“維權”而捲入政治麻煩；客觀上而言，他們乃是在努力拓寬“國家”之外的“公共領域”。由此看來，守望教會的處境可說與傑弗遜當年面對的“教會”無異。而這條道路直接與“神道設教”相抗衡。

守望教會的作法，使中國政府處於兩難境地。一方面，中國正在大踏步地從“傳統國家”邁向“現代國家”，至少目前看來，沒有任何理由可改變中國政府這一決心；而“現代國家”就要求放棄“神道設教”的理念和措施。另一方面，一旦容許“守望教會”註冊，並擁有自己的教堂，至少會引起兩個連鎖反映：首先等於宣告“非政府組織”合法化，很可能在短時間內出現自由組黨的呼聲；其次則等於宣告放棄了正統（官方）“意識形態”，國家不再干預社會和個人的精神生活。

也許正是這“兩難”，使政府不想採用過去的作法，直接動用國家力量來對付守望教會，而是以柔性威逼的方式，讓其知難而退。可畢竟“守望教會”已經過早地將連接“傳統國家”與“現代國家”之間的臍帶拖了出來。

現實的問題是：“政教分離”究竟有多大的可能性？只要還是共產黨執“政”，“教”就必然還是由“馬列意識形態”主導，“政教”就不可能“分離”。若“政”是“國家”，“教”是社會任何“宗教團體”，那麼，只要“國”還在“黨”之下，就不可能允許“國”之外還有獨立的“社會實體”（NGO）合法存在，也沒有必要去建一堵“牆”。

看來，“神道設教”的運作慣性依然會延續下去。所不同的是，政府在不斷將“異己”納入“主流”之時，對“主流”也會不斷地作與

時俱進的改變（改革），以期盡可能地體現時代的“寬容”，來縮小與“異己”之間的距離，從而將可能出現的社會震盪減小到最低程度。

歷史的慣性、現實的困境、未來的期待，三者究竟如何綜合權衡，是思考社會現實議題的人必須尋求的智慧。

我想起當年耶穌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對滿臉困惑的門徒作最後的教導，堅固他們的信心：“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世代還沒有過去，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都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但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獨父知道。”（《馬太福音》24:34—36）



作者為基督教與中國研究中心總幹事

註：1. 原文：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 respecting an 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 or prohibiting the free exercise thereof; or abridging the freedom of speech, or of the press; or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peaceably to assemble, and to petition the Government for a redress of grievances. 2. 在1947年的“艾弗森訴教育委員會”一案中，雨果·布萊克大法官在法院的判詞中寫道，“傑弗遜總統有關‘國教確立條款’的說法，就是為了樹立一個在宗教與政府之間的隔離牆”。3. Anderson Cooper. 有線電視新聞網 [2007-12-31]. “COOPER (原話) 美國絕大多數人，約有85%的國民是基督徒。而有超過三分之二的美國人認為美國是一個基督教國家。” 4. 約翰·洛克，《論宗教寬容》，吳雲貴譯，北京：商務

(轉下頁)

## 新書出版



中國現代化視野下的  
教會與社會

去年十月中旬，“研究中心”與台灣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聯合舉辦學術會議，主題為“現代化視野下的教會與社會”。來自中、港、台、美國和芬蘭的25位專家學者出席了會議，從各自的學術領域，針對這個不容迴避的社會歷史現象，發表了見解獨到、立場各異的精闢論文。

經過半年多的編輯和審批，《中國現代化視野下的教會與社會論文集》終於在今年九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相信讀者能從這些學者的研究中獲益匪淺，啓發多多。

預計本書將於十月中運至洛杉磯。建議奉獻每本 \$20。

# 一個呼喚“父親”的年代

張路加

今日北美與其他各地海外的校園中，隨處可見一群非常年輕甚至帶些稚嫩的中國留學生身影。他們大多是唸大學本科，有的甚至是讀高中，或只是學語言。他們基本上是所謂的“九零後”一代，有部分雖出生



在八零年代，但在個性等方面可被歸入具九零後特徵的所謂“後八零一代”。毋庸置疑，一波新的中國留學生潮又正席卷著北美和歐洲，也給海外的華人教會帶來新一波的福音良機。

美國前駐中國大使洪培博曾撰文稱，美國高等院校至今仍在吸引著全球各地出類拔萃的學生，而中國學生為數最多。目前中國在美的學生將近12.8萬，已超過印度，成為外國學生最大的來源地。<sup>1</sup> 2009至2010學年，美國各大專院校中國學生增長30%，而以本科生為主要增長群體。<sup>2</sup> 2009至2010學年，國際學生為美國經濟注入了199億美元，其中18.5%來自中國學生，相當於約40億美元。<sup>3</sup> 近兩年中國留學生低齡化趨勢越來越明顯，根據教育部公佈的資料，2009年高考棄考人數為84萬，2010年則接近100萬，其中因出國留學而選擇棄考者近20萬，比例達到21.1%。<sup>4</sup>

美國前駐中國大使洪培博曾撰文稱，美國高等院校至今仍在吸引著全球各地出類拔萃的學生，而中國學生為數最多。目前中國在美的學生將近12.8萬，已超過印度，成為外國學生最大的來源地。<sup>1</sup> 2009至2010學年，美國各大專院校中國學生增長30%，而以本科生為主要增長群體。<sup>2</sup> 2009至2010學年，國際學生為美國經濟注入了199億美元，其中18.5%來自中國學生，相當於約40億美元。<sup>3</sup> 近兩年中國留學生低齡化趨勢越來越明顯，根據教育部公佈的資料，2009年高考棄考人數為84萬，2010年則接近100萬，其中因出國留學而選擇棄考者近20萬，比例達到21.1%。<sup>4</sup>

## 後現代思潮席捲下的“九零後”

這一波深受“後現代思潮”熏陶的年輕學子，特色是“i-時代”風格：頭不離耳機、手不離電腦，不少人一擲千金而面不改色，張口閉口“網絡語言”、“火星文體”，令到和他們不同代的人感覺手足無措、欲迎還拒。連他們的父母都感覺溝通困難，兩代之間互相覺得不被理解。

其實，這一代人的整體特徵還是十分鮮明的，可歸納出如下一些重點：

1. 注重主觀，樂於表達
2. 接受超然，嚮往神秘
3. 重視關係，在乎過程
4. 看重感覺，強調享受

中國的“九零後”是第一代完全在網路時代成長起來的人，網路幾乎成為“九零後”與其他“XX後”溝通的唯一平台。逛開心網、人人網等社交網站，玩「微博」，通過聊天工具QQ交流等，並在這些平台上組建自己的「部落」或「群」，用「火星文」交流（“火星文”也被他們戲稱為“腦殘文體”），成為他們生活的主要部分。

然而，虛擬的網路場景畢竟無法取代現實世界，因此，他們的人生充滿了更多的張力和矛盾。看上去充滿自信，但其實較為脆弱，富有理想但常常平凡，重視維權但時常受限，消費自主但習慣攀比，渴望友誼但矛盾較多，喜歡學習但厭倦努力，使用傳媒但容易失控，父母寵愛但溝通不暢，渴望成功但害怕付出……。一般認為，今日的“九零後”具有相當鮮明的三大傾向：“素食”傾向——重視環保、身材、健康、“綠色”；“速食”

（接上頁）

印書館，1982，第27頁。 5.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弓融曰：“盥者，進爵灌地以降神也，此是祭祀盛時，及神降薦牲，其禮簡略，不足觀也。” 6. 唐孔穎達《周易正義》：“薦者，謂既灌之後陳薦薦豆之事。” 7. 唐孔穎達訓為信，顯若學顯然。顯然是敬慕之狀。 8. 董仲舒《春秋繁露·祭義》：“祭者察也，以善達鬼神之謂也。善乃遠不可聞見者，故謂之察。若以名之所享，故祭之不虛。安所不察哉？祭之為言祭也與，祭然後能見不見。見不見之見者，

然後知天帝鬼神。知天命鬼神，然後明祭之意。”此以為祭又在於察知所不可見之天命鬼神，可為佐證。 9. 《禮記》禮記·祭統。 10. 《新唐書·禮樂志一》。 11. 趙汀陽，“反政治的政治”，載《哲學研究》（京），2007.12.30-41。 12. 曹志：《洛桑事件後守望教會與政府關係走向》原載守望教會刊物《杏花》，2010年第四期（總第十四期），82-93頁。此版本是原稿。

今天許多的父親好像舊約路得記中的以利米勒一樣，在他們的兒女心目中早已經“客死他鄉”了。  
Today many fathers were, like Elimelek in the book of Ruth in the Old Testament, considered by their children dead in a faraway place.

傾向——重視速度、效果、變化、創意；“世俗”  
傾向——重視享樂、感覺、個性、消費。

快速變化的外部世界、越來越冷漠及緊張的人際關係、高漲的物價以及求職不易所帶來的壓力，使得他們口中不經意間就吐露出諸如“鬱悶”、“寂寞”、“崩潰”等字眼。甚至“神馬（什麼）都是浮雲”、“人生就是杯具（悲劇）”成了口頭禪和主色調。中國多項社會調查均顯示，這個群體具有相當高比例的嚴重心理問題，許多人甚至輕生了事，或是整日“宅”在家中，不敢面對外部世界和社會。

## 父親們去了哪裡？

一個無助而又鬱悶的群體，一群和父輩們迥然有別而又相互無法溝通的大孩子們。人們不禁要問：他們真的不再需要父親了嗎？

2009年1月，《重慶時報》報導了一件事：“……快過年了，一批重刑犯即將被槍決。重慶南岸區看守所的高牆外，一群親屬正等著與犯人們作最後的訣別。會見前，法官對一王姓犯人宣讀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核准裁定書。王大約二十三、四歲，沒什麼表情。17時10分，他父親在民警陪同下，走進高牆。在一道堅實的鐵門兩邊，父子隔門相望。身材瘦小的父親，從上衣口袋掏出一張發黃的照片遞給兒子：“這是你媽的照片，你拿著，她有病不能來送你了。雖然你要受到最嚴厲的懲罰，但我們還是認你這個兒子。”兒子眼圈紅了，哽咽道：“爸爸，你和媽媽要保重身體。”父親點點頭：“我們會照顧好自己的，你不要擔心。”兒子重重地噓了一口氣，沒有說話。會見室很安靜。有那麼一會兒，父親怔怔地望著兒子，然後平靜地說：“現在你站起來，有一個規矩還是要講的。”兒子一愣，慢慢站起身。父親也站了起來，突然跪下去，說：“我沒有教育好你，按我們農村老家的規矩，給你磕個頭吧！”這個動作不但兒子，也讓現場的民警大吃一驚。兒子反應過來，隨即跪下去，眼淚又流出來：“爸爸您不能跪，該跪的是我。”父親磕頭後，站起身：“該說的都說了，其他的話也沒有意義了。我走了。”說完，平靜而深情地望了一眼兒子，轉身快速離開，再也沒回頭。“爹媽，你們要保重身體啊！”兒子看著父親的背景，長跪不起，淒聲叫道。……”<sup>5</sup>

2010年10月11日下午四時許，湖南衡陽26歲女青年蘇莉自當地公安局大樓七樓墜樓，對面的錄像探頭清晰的錄下了這一幕。視屏中能聽到下墜中

的女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喊：“爸爸救我！爸爸救我！”當她的父親從百多公里之外趕到時，面對的已經是女兒一具冰冷的屍體。<sup>6</sup>

今天許多的父親好像舊約路得記中的以利米勒一樣，在他們的兒女心目中早已經“客死他鄉”了<sup>7</sup>——或者因生計所迫不得不長年在外面打工，或者為了拼命賺錢而棄家不顧；更多的則是和配偶離異而離家出走了。2011年5月公佈的中國民政事業統計資料顯示，單單今年第一季度，全國就有46.5萬對夫妻辦理了離婚登記，較去年同期增長了17.1%，即平均每天有5000多個家庭解體。中國離婚率已連續七年遞增。北京、上海的離婚率都已超過30%。單親家庭正在中國的大地上快速的增長著。<sup>8</sup>

這是一個父親“缺位”的年代，這又是一個處處聽見呼喚“父親”的年代！

## 美好的“父親”楷模——保羅

聖經哥林多前書4章15-17節中，我們讀到了使徒保羅向他的屬靈兒子提摩太以及許多那時代年輕人的深情剖白：“你們學基督的，師傅雖有一萬，為父的卻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穌裡用福音生了你們。所以，我求你們效法我。因此我已打發提摩太到你們那裡去。他在主裡面，是我所親愛，有忠心的兒子。他必提醒你們，紀念我在基督裡怎樣行事，在各處各教會中怎樣教導人。”一個何等美好的屬靈父親的形象，在這段經文中躍然紙上。

首先，保羅是帶著真正的“為父之心”，在基督裡用福音生下屬靈的兒女；他四處奔走勞力、只為領人歸主；負起屬靈責任、殷殷勸勉警戒；辛勤付出一切、迫切守望代禱；甘受生產之苦、完全捨己為人。

其次，是保羅真正明白，當父親和“做師傅的”，角色截然不同：

1. 數量的不同——“父親”的稀少  
vs. “師傅”的眾多；



“親情福音”理念不正是聖經一以貫之的教導嗎？不正是道成肉身的基督親自所帶給這個世界的嗎？Isn't the idea of "kinship gospel" resonating with the teachings of the entire Bible? Isn't it being brought to the world by the incarnated Christ Himself?

2. 質量的不同——“生養”  
vs. “收徒”；
3. 感情的不同——“求你們”  
vs. “罵你們”；
4. 方法的不同——“效法我”  
vs. “你去做”；

一個真正按照聖經當好父親角色的，最後一定會嘗到結實累累的喜樂，並帶來屬靈的傳承和見證。提摩太之於保羅就是一個明證。他是在主裡面的（和主的關係密切），是保羅所親愛的（和屬靈父親的關係密切），是有忠心的（事奉殷勤、竭力擺上，和他的父親一樣），是會提醒教導他人的（效法屬靈父親，承擔起督責、勸勉、及做人榜樣的角色），是會紀念保羅“怎樣行事，怎樣教導”的（同樣能夠言傳身教，帶出屬靈的傳承）。一個原本體弱膽怯、性格內向的提摩太，在屬靈父親保羅的帶領下，成長為初代教會的重要領袖，更成為神國精兵和福音使者，身心靈都得著健康發展，也成為歷世歷代以來多少年輕人的佳美榜樣。

說到底，有怎樣的父親，就會造就出怎樣的下一代！

## 一個成功範例

2003年冬季，正值聖誕，三位年齡加起來超過200歲的長者，離開在美國底特律溫暖的家，大老遠地來到德國東部，在漫天飛雪中，一個校園一個校園地尋找他們的屬靈孩子——那些自中國前來留學的學子，將他們一個個地摟進懷中，帶進基督裡。《歐洲校園事工》（Europe Campus Ministry）就此誕生了！

一首寫給在那裡初結識學子們的小詩，名為《想念》，道盡了這幾位作“父親們”的心情：“葉落風寒，冬雪將至，想念你們！在這歲末時節，在這異地他鄉，想念你們！想你們豎著衣領，奔波在學習與打工之間，想你們拎著菜，背著書包，趕著公車……想你們這麼年輕，這麼真誠，這麼熱情；你們有夢想有憧憬，有艱難有迷茫，有追求也有盼望；這麼多的鄉思，這麼多的煩惱，這麼多的奮鬥！想你們，在這異地他鄉！……想來看看你們，聽聽你



們的心聲，瞭解你們的心情；想來聊聊天，敘敘鄉情，回憶我們年輕的往事，談談我們的奮鬥歷程，分享我們在基督裡的喜樂和平安……”

們的心聲，瞭解你們的心情；想來聊聊天，敘敘鄉情，回憶我們年輕的往事，談談我們的奮鬥歷程，分享我們在基督裡的喜樂和平安……”

由此，歐洲校園事工就讓“父子親情”包裹中的十架救恩，成為了其核心理念和事工標誌：不只是將基督福音帶給在歐洲的學子們，更是對他們如家人般的陪伴、呵護和言傳身教；在血濃於水的屬靈親情中展現福音，將屬靈的父親形像帶到他們中間，也幫助他們將來成為真正有基督生命的、負責任的人父人母、人妻人子。

至今短短的七年多中間，由這三位白髮老人們所開創的歐洲校園事工，感動了近百位北美華人教會的弟兄姊妹參與和投入，也帶領了無數的歐洲學子們從認識基督到委身事奉。他們當中湧現出一批批的“提摩太”和“路得”，由經歷“親情福音”到實踐“親情福音”，成為下一代的屬靈父母（事實上他們中間幾位帶領者已經被當地學子們親切稱為“爸媽”！）。而如今遍佈德東，也開始深入德西的十個團契，三個福音中心，並正式成立歐洲校園事工——德國分支，正在述說和見證著福音的大能，傳遞著從基督而來親情，也在不斷詮釋著“親情福音”這一源自聖經的事奉理念。得著福音的學子們，不少已經學業有成回到中國，不但在專業上報效國家，更在廣袤的大地上播撒帶著基督愛和親情的福音種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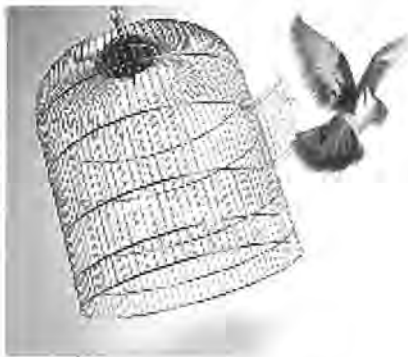
“親情福音”理念不正是聖經一以貫之的教導嗎？不正是道成肉身的基督親自所帶給這個世界的嗎？不正是從舊約的波阿斯到新約的保羅所身體力行的嗎？

惟願我們把握如今福音良機，真正在基督裡將“八零/九零後”這年輕一代視作我們自己的孩子，在他們中間活出福音，見證基督裡的親情，承擔起屬靈父親的崇高使命。如此，這“鬱悶”和“寂寞”的一代，必將能在基督裡健康成長，成為光明燦爛的一代，為明日中國乃至世界的帶來祝福和希望！



作者為播種者國際協會中國事工部主任

註：1. 中國新聞社，2010年12月6日 2. 同上 3. 同上 4. 《南都週刊》，2010年7月14日 5. 《重慶時報》，2009年1月17日 6. 《武漢晨報》，2010年10月14日 7. 詳見聖經路得記 8. 《人民日報》，2011年6月2日



# 發現靈魂之旅（三）

## “我思故我在”

周小安

以塞爾為代表的當代心靈哲學家，對各種唯物論心靈哲學——如物理主義、行為主義、計算主義、消除主義、與副現象主義等——發出猛烈的批判<sup>1</sup>，使得曾在半個世紀內顯得勢不可擋的唯物論，在心靈哲學領域的地位終於動搖了。這就為心靈或靈魂的再發現掃清了道路。筆者想引述布魯斯·昂的一段話來作說明：

“因為我們關於物質實在的知識仍然非常有限，所以必須承認，在我們稱為腦的有機體系中存在著特殊的‘感覺’實體，是完全可能的。然而，這種可能性在今天還沒有得到哲學家們的認真對待。現在最為流行的觀點是：感覺經驗是物質存在的感覺‘狀態’，這種物質存在是由更基本的物質實體構成的聚合物。但是我們如果不簡單地忽視感覺經驗的顯著性質，……就必須說明，感覺經驗的顯著性質可以由純粹的物質元素的性質構成，或者說可以還原為純粹的物質元素的性質。沒有哪個哲學家接近了這一點。因此，一個純粹唯物主義的，或者強調地說物理主義的人的概念，……幾乎沒有任何根據。”<sup>2</sup>

直到不久以前，人們還普遍認為，笛卡爾二元論是導致臭名昭著的心身問題的根源；若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拋棄二元論。然而，誠如約翰·海爾所指出的：“當然，存在著這樣的可能性，即非物質的心靈可以在物理世界中發揮干預作用。還有這樣的可能性，即物理世界在原因上不是封閉的，而且自然法則在事實上也是可以被違反的。對笛卡爾的二元論的駁斥不能是這樣，即先證明心靈不能干預物質，然後說二元論是虛假的。這種論證其實是以未經證實的結論來對付笛卡爾。確切地說，該論證是建立在似是而非的結論之上的。如果我們接受笛卡爾的二元論，就必須假設非物質的心靈可以干預物理世界的活動，而這種假設，同我們無論如何都必須接受的現代科學的一個基本前提，是相矛

盾的。”<sup>3</sup>

筆者認為，假設非物質的心靈可以干預物理世界的活動，的確會同現代科學的一個基本前提——物理世界在原因上是封閉的——相矛盾，但上述基本前提卻並不是“我們無論如何都必須接受的”。筆者還認為，恰恰是由於笛卡爾二元論包含著心身關係，才使得它值得重新受重視，過於各種唯物論心靈哲學，以及唯心主義、各種心物平行論、和生物學自然主義。

此外，從歷史效果上看，近代心靈哲學乃是通過笛卡爾的著述而問世的。笛卡爾並非是持有那類觀點的史上第一人，但在所謂的“近代哲學家”（即17世紀以來的哲學家）中，他對心靈觀點的影響的確最大。甚至可說，笛卡爾是近代再發現心靈的第一位哲學家。

基於上述理由，我們有理由將笛卡爾當作心靈再發現的起點。

## 笛卡爾的實體二元論

### 1. 心靈與物質的三個重要區別

笛卡爾主張，心靈與物質之間存在如下顯而易見的區別：

首先，物質是佔有空間的。它們在空間中佔據著位置，並展現出空間的維度。心靈——如思想和感覺(sensation)——則顯然不佔有空間。第二個重要區別，是性質。心靈的性質不是物質實體的性質，心理的性質在類上不同於物理的性質。在笛卡爾看來，精神性實體所擁有的性質，與物質性實體所擁有的性質之間，沒有任何重合之處。第三個區別，可說是認識論上的區別，涉及我們獲取這些事物之知識的特徵。心靈的狀態是“私人的”，只能為擁有它們的人（或生物）“直接觀察到”；外人只能通過它們的物質後果來推測。物質物件和其狀態則完全不同，它們是公開的。如果你可以從一個角度觀察到一個物質物件或物質物件的狀態，那麼

笛卡爾如何確定心靈或靈魂的實存呢？他的名言“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衆所周知。How was Descartes sure of the reality of the mind or soul? His renowned motto was “I think therefore I am.”

任何具有相應身體結構的人，都可以從你觀察的角度去觀察到它們。

## 2. 實體二元論

笛卡爾主張，身體是具有廣延特性的物質實體。心靈也是實體，卻不是物質的實體。心靈具有思維或意識的特性。每個實體都只能擁有一種本質特性。如果一個實體具有廣延的特性（可以用某種特定的方式在空間延展），就不能具有思維或意識的特性。如果一個實體具有思維或意識的特性（有各種不同的樣式：感覺、印象、信念等），就不能具有廣延的特性。思維和廣延是相互排斥的。心靈是思維的實體，身體則是廣延的實體，因此心靈不同於身體。



笛卡爾認為，構成世界的是兩種實體：物質實體和心靈實體。儘管心靈實體與物質實體完全不同，但是它們之間可以相互作用。你的身體會對你的計畫和決定作出反應。你的心靈可以在感覺經驗中接受你身體的信號，並從中獲得身體狀態和外在世界狀態的知識。這個世界只有通過你的感官，即你的眼睛、耳朵、鼻子和觸覺器官，才能作用於你的心靈。

笛卡爾的二元論與常識非常吻合。我們認為自己具有身體，但又認為身體至少在以下意義上不同於自己。我們可以想像，在自己的身體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甚至在完全停止存在之後，自我仍然可以存在。我們可以說，自己具有心靈——還可以談論心靈的變化。然而，儘管你可以想像身體被摧毀之後自我仍繼續存在，卻似乎不能一以貫之地想像，在自己的心靈或自我消亡之後仍繼續存在。

你能夠想像，你的身體在你或你的心靈停止存在之後仍繼續存在（或許作為一個植物人），但這是另外一回事。你甚至可以想像自己換了身體的情況——這在科幻小說中屢見不鮮。但是給你換個心靈或自我，這樣的猜想似乎是無稽之談。當我們說“改變心靈”，其實不是說要用另一個心靈來取代，只不過是改變信念而已。當一個吝嗇鬼變成“一個新人”時，他並沒有換掉自我，只是改變

了他的態度。

## 3. 笛卡爾二元論的洞見與缺陷

如上所述，笛卡爾二元論具有三個要素。第一，把心靈與物質身體理解成不同的實體，在本質上確定心靈或靈魂的實存（至少像物質一樣實存）。第二，物質實體與精神實體各自具有獨一無二的特性，涇渭分明。心靈是能思維的實體，身體是有廣延的實體。第三，心靈與物質身體可以發生因果交互作用；而且這種作用是雙向的：心理事件引起物理事件，並被物理事件所引起。

若用更學術化或形而上學的術語來說，笛卡爾二元論的三個要素，實際上正好處理了關於心靈或靈魂本體論的三個基本問題：（1）靈魂之存在（being）問題；（2）靈魂之本質或實在問題；（3）靈魂存在之方式問題。超過三百五十年的哲學史告訴我們，笛卡爾二元論的洞見，是它的第一和第三個要素，尤其是第一個要素。（詳見下面第二、三節）

笛卡爾二元論最大的缺陷，是它的第二個要素。實際上，正是這個要素導致了它本身的不一致或內在矛盾：既然物質實體的各種屬性與精神實體的各種屬性之間沒有任何重合之處，又如何可能發生相互作用或影響呢？笛卡爾放置在心靈與物質身體之間的形而上學的藩籬，阻隔了它們之間的因果相互作用。

下面我們著重討論笛卡爾二元論中的第一個要素，以後再處理而第二、和第三個要素。

### “我在”與“我思”的關係： 證明？發現？

笛卡爾如何確定心靈或靈魂的實存呢？他的名言“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衆所周知。其實，早在笛卡爾之前，奧古斯丁就把“我”的存在看作是“自明的”起點。他說：“你自己存在嗎？或許你甚至害怕在這一點上犯錯誤，但除非你存在，否則你顯然不可能犯錯誤。”<sup>4</sup> 這就是說，一個犯錯的人，就他犯錯而言，是存在的。所以，人的存在（esse）是一個自明的起點。

“我思故我在”這句話，似是以“我思”為前提、以“我在”為結論的論證。趙敦華就是這樣解讀的，他說：“‘我思故我在’中的‘故’，表示的不是兩個實體之間的因果關係，而是本質和實體之間的必然聯繫。……笛卡兒認為，人們只能通過屬性來認識實體，每一個實體都有一個特殊的屬



心靈的存在和本質需要“指明”……，和“再發現”……，但不需要“證明”。  
The existence and nature of the mind needs to be “designated”... and “rediscovered,”... but does not need to be “proved.”

性：這就是它的本質。從自我的思想活動，我們可以得到自我必然存在的結論。”<sup>5</sup>

筆者認為，以上解讀最大的缺點，就是用“實在”來論證“存在”，而這是次序顛倒的。其實，笛卡爾的名言不一定要如此解讀。我們可以如塞爾那樣，“相信笛卡爾本人也試圖用這句話去記錄對於心靈的實存與內容所作的內省。”<sup>6</sup> 更準確地說，笛卡爾的名言不是通過“我思”來證明“我在”，而是通過“我思”發現了“我在”，即心靈或靈魂的實存。

康得曾說，至今不能證明外部世界的存在是“哲學家的醜聞”。海德格爾卻說，仍然試圖證明外部世界的存在，才是“哲學家的醜聞”。舍勒則進一步指出，我們沒有必要證明上帝、外部世界、自我以及他人的存在。<sup>7</sup> 如果在這些問題上堅持證明，就從原則上誤解了證明的有限性，並陷入到荒謬之中。對實在或存在進行證明，之所以是荒謬，是因為“證明”總是針對命題的真假進行，而不是針對實在本身進行。筆者認為，針對存在本身而言，“理論”或“邏輯證明”充其量也是不充分的。

更何況，並不是所有命題都是可以證明的。有些命題需要通過其他命題來確證自己為真，但所謂的其他命題卻只能被顯示，而不能被證明。例如，“平行線永不相交”是歐式幾何中的公理，它是不能被證明的。如果要證明某種東西是存在的，例如證明它作為生物是存在的，那麼所要證明的，充其量只是看它是否符合我們對生物的本質認識，並在此基礎上認定它是不是生物，而不是對它的存在本身進行證明；因為它已經在那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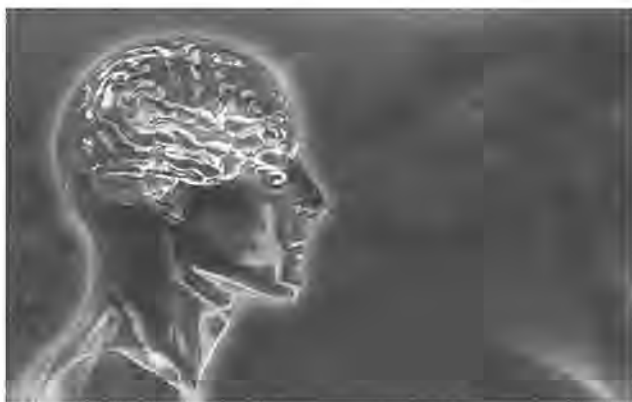
“發現”的邏輯不同於“證明”的邏輯。從根本上講，心靈的存在和本質需要“指明”（即指出有待發現之事物，和發現它的通道，以便別人也能注意或看到它），和“再發現”（即對從前已經顯露過的事物進行再發現），但不需要“證明”。三者的關係是：指明先於再發現，而再發現又先於邏輯證明。由此可見，邏輯證明始終建立在存在論的基礎上，而存在始終先於邏輯證明。

舍勒指出，唯物論者或經驗主義者否認靈魂存在的錯誤在於：他們堅持人的認識只依賴感官經驗，以為只有在感官經驗中，被給予的東西才是最基本的認知材料，我們的認識只能建立在這種認知材料的基礎上。由於靈魂並沒有在我們感性的經驗材料中被給予，所以，它並不存在。舍勒承認，任何存在的事物的確都必須有一種與之相應的經驗方

式或認識通道，只有通過這種方式或認識通道，關於存在事物的基本材料才能被給予。但是，對於認識而言，再沒有什麼比一開始就把經驗方式限定在某種狹隘的範圍、或讓所有的經驗都建立在某種特殊的經驗方式上，更為有害。如此一來，就會把不是通過這種方式獲得的經驗，排斥在人的認知範圍之外。<sup>8</sup>

就拿唯物論或經驗主義這偏見來說，感性經驗絕不是人類認識存在的惟一經驗。即使不談人的“自我經驗”（一種自我感）、靈性經驗（即人與靈界溝通、互動的經驗）、宗教經驗（即人與上帝的溝通、互動的經驗）、審美經驗和道德經驗，僅僅指出近代以來的科學所忽略的感性經驗中“主觀經驗”成分，或第二性的質，如紅色、冷、熱、濕、軟、硬、香、臭等等，就能看出唯物論和經驗主義的局限和錯誤。

在此意義（即發現而非證明）上，笛卡爾的名言“我思故我在”簡潔概括了他通過某種直接的自覺意識，而發現（或重新發現）了心靈的實存：既知道了心靈的實存，又知道了其內容。而且，這個發現是值得信賴的。因為關於我自己意識的實存，我總不可能出錯吧，故我也不會在關於我自己實存的問題上出錯；因為成為一個有意識的（即正在思考的）存在者，或成為一個心靈，正是我的本質之所在。另外，關於我心靈的內容，我也不可能出錯。比如說，若在我看來我疼了，那麼我確實就是疼了。



我們有理由說：奧古斯丁是中世紀發現心靈的第一位神學家，而笛卡爾則是近代再發現心靈的第一位哲學家。（詳見下篇文章。）

## 笛卡爾的“我思”<sup>9</sup>

前已指出，雖然有人把笛卡爾的名言“我思故我在”中的“我思”解讀為自我反思，但這種解

在笛卡爾看來，對思想行為……的內在意識，是先於任何反思知識的。  
For Descartes the inner consciousness of the action of "thinking" ... is prior to the knowledge obtained by thinking.

讀並不符合笛卡爾的原意。實際上，若把笛卡爾的“我思”理解為對自我的意向性反思，會有兩個問題。其一：既然“我在”依賴於“我思”，則“我思”就須伴隨著我的一生，這個“我思”是哪一種“我思”？第二：衆所周知，笛卡爾提出“我思故我在”的目的，是為了尋找一個絕對的哲學出發點或基點。在找到這個基點之前，我什麼也不知道（沒一個信念是敢肯定的）。那麼我說“我思故我在”豈不是表明我早已既知道“我思”為何物，又知道“我在”為何物了嗎？怎麼又說我這時還在尋求之中，要找一個絕對的哲學出發點呢？後一個問題其實就是所謂古老的“尋求悖論”或“學習悖論”。



實際上，笛卡爾的同代人也提出過這兩個問題。當時有人說：“……也許心靈中有許多東西，心靈沒有意識到。還在母親子宮裏的嬰兒的心靈有思想的能力，但並沒有意識到它（能力）……”

笛卡爾的回答是：“不是思想或與思想相依的東西，就不會屬於思想者的心靈，我們也不能有那種既在心靈內同時心靈又意識不到它的思。就此而言，我不懷疑心靈在嬰兒期就開始思想了，並且它馬上就意識到它的思想了；即使它日後因這些思想的印象並未保留在它記憶中而想不起來。必須注意的是，雖然我們實際上總是意識到我們心靈的行為或運作，卻除了潛在地意識到心靈的機能或能力外，並不總是意識到它們（指機能或能力）……”<sup>10</sup>

笛卡爾所說的“實際上總是意識到我們心靈的行為或運作”不明明指的是自我覺知嗎？這裏“意識”即“意會”，而“行為或運作”即意向活動，從其產生之日起，心靈就一直在“實際地”意識著它自己的意向活動！可見笛卡爾的“思”即“意會”。

再看第二個問題，若“我思故我在”之“思”為意向性認識活動，則對“懷疑”這

一意向行為的意向性之“思”，又可成為進一步反思的對象，如此反復以至無窮。

笛卡爾對這個問題的答復是：“除非一個人知道思想是什麼和存在是什麼，他才能肯定他是在思想或他存在，這是真的。但這並不要求反思的知識，或通過論證而獲得的那種知識，即知道我們知道，並知道我們知道我們知道，如此無窮反復……我們是通過那總是先於反思知識的內在意識來知道它（指“我思故我是”）的，這就足夠了。這一對思想和存在的內在意識是如此地深植於所有人心中，以致即使我們被偏見蒙蔽，重辭甚於重意，從而偽稱沒有它，我們事實上也不能沒有它。因此任何人只要注意到他自己在思想以及隨此而來的他存在，即使他以前也許從未問過思想是什麼或存在是什麼，他也仍然毫不缺乏在這一方面滿足他自己的充足的知識（即‘思’與‘在’）。”<sup>11</sup>

以上“先於反思知識的內在意識”就是自我覺知。在笛卡爾看來，對思想行為（特指“我疑”這一意識行為）的內在意識，是先於任何反思知識的，這種“內在意識”是人生來就有的，它完全不是“反思知識”，但也算得上一種“知識”。用今天流行的術語來說，這個“內在意識”就是“自我意會”——知道自己在知。它當然不同於意向性的自我反思。



作者為物理學博士，現在溫哥華牧會

註：1. 約翰·R·塞爾著，王巍譯，《心靈的再發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約翰·R·塞爾著，徐英瑾譯，《心靈導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2. 布魯斯·昂著，田園、陳高華等譯，《形而上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217。 3. 約翰·海爾著，高新民、殷筱、徐強譯，《當代心靈哲學導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26。 4. 奧古斯丁著，《論自由決斷》卷2，章3節7。轉引自：張榮著，《自由、心靈與時間——奧古斯丁心靈轉向問題的文本學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116。 5. 趙敦華著，《西方哲學簡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215。 6. 塞爾著，《心靈導論》，頁13。 7. 張志平著，《情感的本質與意義——舍勒的情感現象學概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233-238。 8. 同上。 9. 本小節出自：周偉馳著，《記憶與光照——奧古斯丁神哲學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頁153-155。 10. Descartes: *Selected Philosophical Writings*, pp.130-13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11. 同上，pp.127-128。

# 日光之下無新事（中）

## 有神進化論、初期教會、諾斯底主義的回潮

John G. West, 唐理明譯

前言：初代教會堅持，如果沒有上帝是造物主的教義，基督教其他的內容就顯得沒有什麼意義。而諾斯底主義則把上帝和祂所造的世界拉開，其內容複雜又多變異。當今的“新有神進化論”實際上是將基督教和無指導的達爾文主義融合起來，是重新包裝的古老諾斯底主義神學。

### 自然選擇成了新的德米爾奇

古代的諾斯底主義把上帝和祂的創造拉開距離，指認世界的創造為第三者德米爾奇所為。新有神進化論者的德米爾奇，就是按隨機變異運作的自然選擇。達爾文的進化過程和諾斯底主義的德米爾奇一樣，也是盲目的、無知的，不受上帝的指揮；如此，有神進化論者就可以將上帝和他們視為拙劣世界分開，不再為其負責。

許多有神進化論者主張，上帝選擇用沒有指導的過程“創造”世界，祂不去具體控制，也不會預知將有怎樣的結果。其實，上帝是造了一個自我創造的世界。英國聖公會的有神進化論者波金霍恩（John Polkinghorne）說：“以神學來理解，進化的宇宙就是得到許可、能以自我製造的受造界。”<sup>27</sup> 只要讀過有神進化論倡導者的文章，就可清楚看出，這種觀點很難與傳統的上帝預知和主權概念相容。前梵蒂岡天文學家柯尼（George Coyne）宣稱：“甚至上帝也不能……明確知道……會出現人類的生命”<sup>28</sup> 美國布朗大學生物學家米勒（Kenneth Miller）在他的暢銷書《尋找達爾文的上帝》（*Finding Darwin's God*，許多基督教大學採用）中，直截了當地否認上帝引導進化過程以達到某種目的——包括會發展出人類。他堅稱：“進化是一個自然的過程，而自然的過程是無指導的。”<sup>29</sup> 米勒聲明：“人類在這個地球上出現並不是預定的。我們在此出現……是一種後知後覺，是次要的細節，是歷史上的偶然事件——我們很可能被歷史遺漏。”<sup>30</sup>

米勒也清楚，基督徒朋友必定會對這說法提出抗議，因此又說：“進化有適應力，創新力，會測



驗，會實驗，因此遲早它會產生造物主所期望之物——像我們一樣的受造物，可以認識祂，並且愛祂。”<sup>31</sup> 但米勒是在講兩套話。他明明不相信人類（或其他進化產物）可以“完全符合”上帝的意圖。在米勒看來，上帝顯然知道無指導的進化過程非常奇妙，以至於它最終會造出某種懂得讚美祂的“東西”。但那個“東西”會是什麼樣子，則是上帝絕對不去決定的。“不決定”到什麼程度呢？在2007年的一個會議上，米勒承認，如果進化的歷史再重演的話，結果“可能是一個大腦子的恐龍”，或甚至“一個有超強智力的軟體動物（mollusk）”，而不是人類。<sup>32</sup>

有人認為，現代有神進化論更接近自然神論（deistic），過於“有神論”（theistic）；但這種比較對自然神論似乎並不公平。自然神論者通常相信，上帝最初設計並創造了世界，然後才讓它自己運作。然而有神進化論的倡導者認為，上帝沒做那麼多。上帝只不過創造了一個無指導的過程，由它來創造世界，而所產生的活物是祂既沒有預見、也沒有授意的。有時有神進化論者這樣辯解：就和上帝創造有自由意志的人一樣，祂也賦予自然“自由”，不經祂指導而自我創造。<sup>33</sup> 就邏輯而言，這固然是可能的，上帝可以用這個方法來創造，但是

在達爾文的說法下，嚴格地說，上帝不算是創造者。祂最多是建立了一個宇宙大樂透來產生生命，知道只要時間足夠，祂總會贏得頭獎。Strictly speaking, God could not be counted as the Creator in Darwin's term. At most He was to be seen as the founder of a universal lottery to create life with the assurance that given enough time He would win first prize.

就基督教神學而言，支援上帝以此種方式創造這世界的證據則是少之又少。

相反，根據歷史上基督教的教導，世界的唯一造物主是上帝。祂並沒有將這個任務交給不受指導的第三者。不管你用多麼喻意（或字面）的方法來解釋聖經的創造論述，也不管實際上上帝用什麼過程完成祂的創造，聖經和歷史上的基督教神學都前後一致的聲稱，原初的創造是出於上帝的特定意圖。這並不是說，上帝創造世界不能運用次要的因素。上帝很可能用了；但這些次要的因素並非“無指導的”。這是要點所在。在基督教的教義歷史上，這精美卓絕、有條不紊而美麗的自然界，背後的“工程大師兼藝術天才”絕對是上帝，而不是第三者。<sup>34</sup> 相對而言，如果接受許多有神進化論者的觀點，上帝唯一的藝術才能，就是像胡亂向空白畫布濺濺顏料的現代畫家。上帝更像波洛克（Jackson Pollock），而不像米開朗基羅。

有些現代有神進化論者似乎意識到他們的達爾文式上帝和傳統基督教神學有矛盾之處。可能這就是他們為何試圖淡化自己對達爾文式無指導進化概念的依附。由柯林斯（Francis Collins）首創、推動有神進化論的生物道基金會，裡面的成員便似乎採用了這個辦法。雖然柯林斯和他的基金會推薦倡導無指導進化論者〔例如米勒〕的書，其理事們對於究竟進化的“無指導”到什麼程度，看法卻較為保留〔至少較為模糊〕。

以現任生物道副總裁傑卜生（原為該基金會的聯席總裁）所寫的文章為例。一方面，傑卜生說：“作為一個上帝的信徒，我的‘先決立場’是肯定世界絕非偶然而成，而且，從某種神秘的角度而言，我們的存在是一個‘按照期待’的結果。”

<sup>35</sup> 另一方面，傑卜生說他“站在達爾文這一邊，否認上帝對細節負責。”<sup>36</sup> 至於生命歷史中究竟哪些事件屬於“細節”，傑卜生則不明說。人類是否屬於不在上帝意想中的“細節”？傑卜生在書中沒有說；2009年於拜歐拉大學（Biola University）的一次座談會中，有人公開問他的觀點，他也沒有提供清楚的看法。<sup>37</sup> 傑卜生和米勒一樣，起先說：“我想，‘像我們這樣的活物’應該是可以預測到的，因為其場景為：上帝已經預期如此。”但傑卜生也像米勒一樣，表示“像我們這樣的活物”只不過是指任何一種“具有特殊形式的自覺意識、可以和創造者產生關係的活物”。他又承認：“我認為很難指證說，我們現有的這種模樣正是上帝有意作成的。”那麼，對“人類反映出上帝特定的意圖”，

傑卜生是接受還是拒絕？“嗯，我想，我必須知道這裡的‘特定’是指什麼。我不能夠想像，上帝就是要得到一個有五個指頭、拇指可以相對等的活物，而祂若沒得到這樣的活物，祂就不開心，因為這是祂特定的意圖。”〔譯註：這句似是而非的話，關鍵是在“我不能夠想像”〕有人追問說，米勒主張達爾文的進化全無指導，可能會出現有思考力的蛤蜊和大腦袋的恐龍，而不是我們，對此他有何看法。傑卜生回答：

嗯，那是一種諺語（oxymoron）。因為只要你有思想，你就不會是蛤蜊，而如果你是蛤蜊，你就不會思想。我的意思是，他乃是要說明一件事。按照字面解釋上帝的話是一回事，按照字面解釋米勒的話，則是另一回事。我想我可以說，米勒說這話的意思，是指：你我可以幻想一個世界，其中像我們這樣具智慧的活物，外形可能像蛤蜊或恐龍；上帝的形像和上帝對我們身體結構的想法，並不一定非要是我們現在這副模樣。

我們必須在此說明，問題並不是上帝能否創造人類以外的理智動物（祂當然能），甚至也不是“五個指頭、拇指可以相對”一定得是按上帝形像而造的特徵（當然不會是）。問題乃是，上帝是否不參與進化的“細節”到一個地步，以至於進化將產生會思想的蛤蜊還是會思想的人，祂都不作決定。說米開朗基羅除了雕塑著名的大衛像之外，還可以創作許多傑作，是一回事；但若堅稱，他不太參與雕塑過程，以至最後雕出來的是人像還是蛤蜊〔或說，塑像是二十個手指還是十個〕，他既不知道也不關心，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試圖調和無指導的達爾文進化論和基督教，難處並不在於上帝有沒有創造不同世界的



自由，而是，在達爾文的說法下，嚴格地說，上帝不算是創造者。祂最多是建立了一個宇宙大樂透（lottery）來產生生命，知道只要時間足夠，祂總會贏得頭獎。不論別人對這種上帝觀有何看法，聖經和基督教知識分子的傳統觀點絕非如此。

柯林斯在全無指導的進化路上究竟願意走多遠，他和同僚傑卜生一樣，始終含糊其辭。一方

為了避免讓無指導的達爾文主義和上帝的主權直接起衝突，柯林斯似乎把上帝描繪成一個宇宙魔術師，矇騙了人們，讓他們以為自己被造的過程是盲目而無目的的，其實不然。 To avoid the conflict between unguided Darwinism and the sovereignty of God, Collins seemed to portray God as a universal magician who deceived mankind to imagine that the process of their making was blind and purposeless. But in fact it was not.

面，柯林斯留有餘地，認為上帝“可能”知道並定下所有進化的結果；另一方面，2008年柯林斯又在一次關於科學和開放有神論（開放有神論持否認上帝完全知道未來事件的立場）的會議上作主題演講。<sup>38</sup> 柯林斯有時撰文，好像他相信生命歷史的主要部分〔甚至包括人類〕實際上不是上帝所指導的。他對所謂“DNA廢料”的看法特別有啟發性。他聲稱（其後證明是錯誤的）“大約45%的人類基因組是由基因漂浮物和丟棄物所組成”<sup>39</sup> 他同意：“有人會爭議說，這些實際上是有功能的成分，是造物主基於一些理由有意放在那裡的；而我們把它們當作‘DNA廢料’，顯示了我們目前無知的水平。”柯林斯的結論擯斥了這種解釋：“它們當中有些小部分可能有重要的控制作用。但是一些例子讓這種解釋顯得太過牽強，可信度很低。”柯林斯討論DNA廢料，用意很清楚，就是表明他相信人類基因組到處是無功能的“廢料”垃圾，是在達爾文無指導的進化過程中所無意產生的。

但是柯林斯試圖轉移討論的題目，從上帝是否知道並計劃了人類，轉成人類是否真需要目前的各項身體特點，才算是按上帝的形像而造：

進化的思想“充滿了機遇和隨機結果”，這樣的概念怎麼能夠和人類是“按神的形像創造”（創世記1：27）的神學概念相調和？嗯，可能人們不必太過慮聖經所說的是指身體上的結構——上帝的形像應該更多與意念有關，而不在于身體。上帝有沒有腳趾甲？肚臍眼？

這是轉移話題。問題並非如柯林斯所言，上帝能否選擇創造一個有祂形像、卻沒有腳趾甲的生物。問題乃是，當今人類的存在是否反映出上帝特定的選擇和精美的才藝，或只不過是一個無指導過程無意中的產物。

然而柯林斯也有可取之處，他似乎明白，這說法和傳統基督教神學家有尖銳的矛盾，因此他在以各種方式質疑人類的設計之後，又為對他的論點感到不自在的人提供了一個逃生門。但是這個逃生門本身也有神學問題。

## 上帝是宇宙的魔術師

柯林斯提出，上帝可能從亙古就知道並決定了進化的結果，但祂造世界的方式，卻是使它看起來像是出於隨機和無指導的過程：

從這背景來看，進化就我們看來是由機遇所驅動，但是從上帝的角度看，結果則完

全是出於特定。因此，上帝可能完全親密地參與了所有物種的創造，而從我們這受限於線性時間轄制的角度看，就像是一種隨機和無指導的過程。<sup>40</sup>

柯林斯確認，生物世界看起來像是“隨機和無指導的過程”的產物，這就使他的立場顯得很奇特，他對生物智慧設計的敞開程度，甚至還不及倡導達爾文主義最不遺餘力的無神論者道金斯。道金斯和柯林斯不同，他毫不猶豫地同意，生物世界充滿著“複雜的東西，看起來像是有目的的設計。”<sup>41</sup> 換句話說，道金斯相信生物界中的東西看起來好像是設計而來，他只是認為，達爾文的無指導進化理論提供了足夠的理由，足以讓人不理睬表面的設計現象。柯林斯則相反，他堅持生物界中的東西看起來是“隨機和無指導的”，而只有通過信心的眼睛，我們才知道這種無設計的表像是欺哄人的。因此，道金斯堅持，從表面看，物件是由設計而來，但其實卻不是；柯林斯則斷言，物件表面看來不是出於設計，但其實卻是。

柯林斯的逃生門妙處在於，它在邏輯上能符合傳統對上帝主權的認識。他的觀點容許上帝主動（即便是暗中）引導創造的發展。但是這和聖經對上帝與祂普遍啓示的說明仍然有嚴重的衝突。舊約與新約都清楚教導，人類可以通過觀察認識到上帝在自然界的手藝，無需通過特殊啓示。詩人宣稱：“諸天述說祂的榮耀”（詩篇19），使徒保羅在羅馬書1：20也論及：“自從創世以來，上帝無形的本質——祂的永能和神性——是可清楚看出的，藉著受造之物就可以明白，叫人無可推諉。”這類經文清楚教導了自然界是出於設計的概念。耶穌親自指出，飛鳥的餵養、下雨和日頭、野地百合花精緻的設計，都是可見的憑證，顯示上帝主動護衛世界和其上的活物（馬太福音5：44-45，48；6：26-30）。前面已經提到，上帝對自然界的設計可由觀察而得，也是早期教父著作中的重要主題。<sup>42</sup> 為了避免讓無指導的達爾文主義和上帝的主權直接起衝突，柯林斯似乎把上帝描繪成一個宇宙魔術師，矇騙了人們，讓他們以為自己被造的過程是盲目而無目的的，其實不然。

究竟柯林斯是否真正相信他所發明的這種保持上帝主權的“中途之家神學”，我們無從得知。但如前面所提，他的一些言論（例如，他提倡“廢料DNA”說）顯示，他對上帝究竟是否真正指導了進化過程，其實有很深的懷疑。姑不論柯林斯本人的觀點為何（他對此問題可能還搖擺不定），他

（轉下頁）

# 天地有多寬 巧合知多少？



我相信宇宙間有  
15 747 724 136 275  
002 577 605 653 961  
181 555 468 044 717  
914 527 116 709 366  
231 425 076 185 631  
031 296 個質子和同  
樣數目的電子。

英國天文學泰斗艾丁頓  
(1939)<sup>1</sup>

大文豪郭沫若問道：“宇宙呀，宇宙，你為什麼存在？……你若是個有限大的空球，那擁抱你的空間，他從哪兒來？”（《鳳凰涅槃》）。不拘小節的詩人，無心用數字來貶抑詩意；數學家則恰恰相反。因“阿基米德原理”而家喻戶曉的希臘數學天才阿基米德（Archimedes），2300年前已經對宇宙的大小做深刻的研究。從太陽的軌道和地球的大小推算，他發現，如果宇宙裝滿了極微小的沙粒，這沙粒的總數應該是 $10^{63}$ （一千萬億億億億億億億，10後面有63個零）。事關緊要，阿基米德寫信向皇帝匯報：“有人認為，世間沙粒的總數是無限大。……即使有人不認為這個數目是無限大，也無法認定一個比 $10^{63}$ 更大的數字了。”（Harrison, p. 487）

兩千多年來，沒人對這個數字感到興趣。直到20世紀初，科學家才開始研究這樣大的天文數字。1938年，英國科學家艾丁頓（Arthur Eddington, 1882-1944）從大量科學資料中算出宇宙的極限。於是，在一次重要的哲學演講中，他半開玩笑地宣佈了宇宙間核子的總數。後來，這個數字（大約是 $10^{80}$ ），就成為有名的“艾丁頓數字”（Eddington Number）。艾丁頓是舉足輕重的天文物理學家，比

愛因斯坦低不了一個頭。但有一點他比愛氏明智：從天文資料判斷，他認為宇宙不是永恆的，而是有起點、有擴張的，且是有限的。但是科學界的“先知”是不太受尊敬的。30年後“大爆發論”（Big Bang Theory）成立，科學家發現，宇宙間無數的巧合似乎都和“艾丁頓數字”有緣，這才體會到他的先見之明。

## 不可思議的龐大

宇宙起源的“大爆發論”，是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科學發現。而在大爆發論山雨欲來之前，有些風聲滿樓的科學故事。

我們的時鐘，是以地球環繞太陽的週期為單位來計算時間。物理學家嫌這單位過於大大咧咧，太不準確。他們用一個核子（相當於一個氫原子）的質量作為質量單位，稱為“核”（nucleon）；而用一個核子的大小（ $10^{-13}$  厘米）作為距離單位，為了紀念著名物理學家費米（Enrico Fermi），稱之為“費米”（fermi）。從而，光行走1費米所需要的時間，便成了計時的基本單位： $10^{-23}$  秒，稱為1“基飛”（jiffy本不是科學詞語，而是形容時間短暫的俗語。科學家找不到合適的字，就順手牽羊

（接上頁）的“新有神進化論”同事當中，許多人都拋棄了這中途之家，而熱烈地擁抱“上帝既不知道也不刻意要進化產生什麼結果”的立場，這就使得他們的觀點非常接近早期的諾斯底主義。現代有神進化論和古代的諾斯底主義一樣，以不受上帝特定指導和控制的第三方，來取代主動創造的上帝。

降低上帝造物主的主動角色，還不是現代有神

進化論重新發揚古代諾斯底主義的唯一之點。第二個相似處更為驚人，就是否認世界起初造是美好的。（待續）



譯者現已退休，退休前曾為UCSF醫院腫瘤科登記員

註：本文的註請參考網上版本

如果大爆發後的擴張速度差了億萬（ $10^{29}$ ）分之一，星球就不可能存在，生產碳和氧等元素的大烤箱也不可能存在，滋養生命的條件就化為烏有。If the expansion speed after the Big Bang has a difference of  $1/10^{29}$ , the stars could not have appeared. The furnace that produced elements like carbon and oxygen would not have existed. The conditions for cultivating life would not have occurred.

了。）

英國牛津大學量子物理學權威迪拉克（Paul Dirac），1933年得到諾貝爾獎後，對天文學的奧秘大感興趣，特別是天文的數字。他算了算，可見的（observable）宇宙，大小是 $10^{40}$  費米，年齡是 $10^{40}$  基飛。宇宙所含核子的總數，也就是它的質量，相當於 $10^{80}$  核（正好是 $10^{40}$  的平方）。

$10^{80}$  大寫是一億億億億億億億億！這個數字究竟有多大？一個核子的質量是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7克（ $10^{-24}$  grams）。一個跳蚤重0.000001克，相當於6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個核子。怪不得小小跳蚤這麼聰明，你抓不到它。跳蚤看來很渺小，人和地球相比更渺小；地球在太陽系裡很渺小，太陽在銀河中很渺小，銀河在宇宙間更渺小。唯物主義者這點算是說對了，宇宙間都是物質，都是核子。 $10^{80}$  這個數字就代表浩瀚宇宙之間所有核子的總數。

科學家不太願意承認巧合，因此這些天文數字的巧合時時纏著迪拉克。他就繼續探討。我們知道宇宙之間有無所不在的萬有引力；但細小的原子內部電子和質子之間卻有電力（electrical attraction），不然電子就會“出軌”。迪拉克接著發現，不多不少，電力比引力正好要强 $10^{40}$  倍。核子似乎無限小，但是它內部又有這樣嚴格的規律！而小小核子內部的規律，和浩大宇宙之間的規律會有什麼相干嗎？

## 不可解釋的巧合

以上我們看到的天文數字可分為兩類。第一類（N1）計量宇宙“邊際”的大數字，例如宇宙的寬闊（ $10^{40}$  fermi），和宇宙的年齡（ $10^{40}$  jiffy）。第二類（N2）則是計量原子內部狀態的數字，例如核子內部電力和引力的比例（ $10^{40}$ ）。這兩類數字，一個看外表，一個看內心，風馬牛不相及。但是，為什麼它們不但龐大，而且是同樣的大？而且， $(N1) \times (N2) = 10^{40} \times 10^{40} = 10^{80} = N$ ，恰好是宇宙間核子的總數。

1937年，迪拉克就提出了所謂“龐大數字假設”（Large Number Hypothesis）：在自然界中，任何兩個龐大的、無量度（dimensionless [編按：意為極大的純數目]）的數字之間，必定有一個簡單的數學公式將它們聯接起來，其系數為數量級一致單位絕對值（order of magnitude unity）。迪拉克的意思是，這兩類大數字的存在不是偶然的，是有規律的。他提出這樣“毫無根據”的假設，表現出

大科學家的風度。一方面，他有種靈感，覺得有一極為奧秘的自然規律正含苞待放。另一方面，他拋磚引玉，要聽聽他人的意見（Barrow and Tipler, pp. 231-254）。

迪拉克的磚引來一些未經鑿磨的石塊。有人認為，既然N1（宇宙年齡）不斷增長，N等於N1平方，以平方速度增長，說明N是無限大，宇宙也是無限大和永恆的。有人反對宇宙永恆論，認為N的增長是因為物質繼續被創造，符合一種“不間斷創造”（continuous creation）學說。又有人說，根據他的天文測量，光速在逐漸減緩，這才是N增長的根源。這些說法現在看來是可笑的，但那時大爆發論尚未成立，宇宙永恆論十分吃香，因此類似諸說都曾經是科學界的高檔理論。

## 不可推諉的奇蹟

美國有一家換汽車機油的連鎖店，名叫Jiffy Lube，車子開進去，一“基飛”（Jiffy）之間，油就換好了。可是， $10^{40}$  個 jiffy 卻是極大的數字。迪拉克提出了所謂“龐大數字假設”後，科學家把他所用的幾個數學公式翻來覆去的研究，發現它們都含有一個代表時間的變數t。迪拉克要找聯接這些龐大數字之間的系數，踏破鐵鞋無覓處，後人卻不費功夫得到了，原來是時間t。這麼說，宇宙之大，粒子之間引力之小，都和時間t成正比，都是因為宇宙的年齡古老。

自從1929年天文學家赫柏（Edwin Hubble）發現宇宙擴張現象後，千古的宇宙無起源論被推翻。到了60年代，從宇宙擴張速度算起，宇宙就瞞不住他的真實年齡了。科學家發現，大爆發後的擴張速度，對生命能否存在有決定意義。生命的出現，是因為宇宙間有碳、氧等元素（人身體的84%是碳和氧），而這些元素的存在，是因為大爆發後充分的氫和氦在星球中心逐步燃燒，形成氧等元素（宇宙的87%是氫）。如果大爆發後的擴張速度差了億萬（ $10^{29}$ ）分之一，星球就不可能存在，生產碳和氧等元素的大烤箱也不可能存在，滋養生命的條件就化為烏有。如果擴張速度過低，宇宙擴張半途而廢，在星球形成之前宇宙便會倒塌，後果不堪設想。如果擴張速度過高，宇宙會變成極大的氣球，內部空空如也，因為在星球銀河未能形成之前，氫、氦等輕粒子都會擴散得無影無蹤了（Barrow and Silk, pp. 205-207）。

宇宙的年齡古老並不是壞事。達爾文主義者最拿手的論點就是：只要有足夠時間，任何不可

今天科學家討論不休的“人類（存在）原理”更是超越科學領域的一塊碧玉，也是值得我們注目的題目。Nowadays the Anthropic Principle, discussed heatedly among the scientists, is a jasper which surpasses the field of science and is worthy of our attention.

能的事都會變為可能。如果我們把宇宙的“宇宙年齡”（ $10^{40}$  jiffy）化為地球年齡，宇宙誕生是在140億年前。談到生命能否在地球上自發出現，例如一個單細胞生物能否從化學元素的偶然結合產生，著名英國天文物理學家霍伊爾（Fred Hoyle）曾作過這樣科學界家喻戶曉的比喻：這種可能性相當於一陣刮過垃圾場（junkyard）的龍捲風，能用捲到空中的廢料裝配成一架747客機。1990年他向記者解釋這個比喻說，“直到38億年前，因為彗星撞擊造成的艱難環境，地球上不可能有生物。但是，一億年之後，大約37億年前，地球上卻已存在細胞生物。地球在45億年前形成，如果45億年相當於是24小時，那麼一億年好比是半個小時。在這‘半小時’內，在非常惡劣的情況中，你必須發現DNA〔生命藍圖〕，必須製造出〔構成生命的〕數千種酵素（enzymes）。總而言之，〔生命能夠存在的〕景況實在難以想像。”（Horgan, p.106）

## 不該存在的存在

回到“龐大數字”話題。普林斯頓大學天文物理學家迪基（Robert Dicke）和迪拉克舌戰數年後，在1957年指出，迪拉克的假設忽視了生物因素（biological factors）。這種宇宙龐大數字的巧合並非偶然現象，而是宇宙能否容許觀察者（observer）的標誌。宇宙可能存在億萬年，如果沒有被觀察到，豈不是白白存在？科學家所謂“觀察者”，就是指人——那能夠觀察到宇宙存在的理性因素。這種神秘的“生物因素”究竟是什麼？迪基解釋說：

一個星球的輻射率的變化和介電常數（dielectric constant）的負七次方成正比。如果開初的介電常數比今天的介電常數大很多，那麼星球就太冷，人不可能存在，也沒人來擔心這個問題了。反過來，如果開初的介電常數比今天的介電常數小很多，最初大量的輻射會將全部的氫轉變成爲重金屬，人當然不可能存在。（Barrow and Tipler, p. 246）

迪基這樣說法和宇宙永恆論有所抵觸，當時十分驚人。幾年後，大爆發論成立，迪基的推論為科學數據所證實。迪基後來指出，生物能否存在的關鍵，是宇宙電磁力和引力的比例（Leslie, p. 207）。不多不少，電磁力比引力正好強 $10^{40}$ 倍！真是“說曹操，曹操就到”，科學家無法躲避 $10^{40}$ 這個龐大數字！如果這個比例稍有出入，差億億萬萬分之一，宇宙間不可能有生物存在！如果電磁力減弱，星球溫度過高，很快被燒毀。如果電磁力增強，星


球太冷，液體甚至氣體都凍成固體，不可能維持生命。（Leslie, p. 37）

想不到，迪拉克拋磚引玉的“龐大數字假設”，興起了迪基這一代的大爆發論專家。迪基本人也是拋磚引玉的高手，他對宇宙背景的研究奠定了大爆發論的基礎。今天科學家討論不休的“人類（存在）原理”（Anthropic Principle）更是超越科學領域的一塊碧玉，也是值得我們注目的題目。

## 後記

轉眼2000多年，20世紀科學家又回到阿基米德的 $10^{68}$ 無限大數字問題。他們發現，現代人可見宇宙的體積，比阿基米德以太陽為中心的宇宙大 $10^{30}$ 倍，但是，宇宙的密度卻正好比阿基米德所敘述的沙的密度小 $10^{30}$ 倍。所以，巧上加巧，阿基米德的小宇宙和現代人的大宇宙，裝滿了沙以後，質量相等。

一不作，二不休，科學家又算了算，以質量計，每粒阿基米德的細沙相當於 $10^{17}$ “核”。所以， $10^{68} \times 10^{17} = 10^{85}$ ，阿基米德的宇宙所含核子的數量等於 $10^{85}$ ，和迪拉克所數算的完全一樣！是否巧合？是功是過？阿基米德都不必負擔這個責任了，因為他對核子一無所知。據說阿基米德因為太專心於數學研究，連羅馬軍入侵和進城都不知道。突然一個羅馬兵出現，命令他離開；他說能不能等他做完他的數學題再走。那位羅馬士兵聽了一時衝動，就拔出劍來，把他刺死（Harrison, p. 488）。一個數學家為了這樣重要的數字而死，死之無愧。

如果阿基米德知道，他的最大數字推論已經為20世紀科學資料所證實，他必定安然瞑目了。 

作者曾獲得數學、神學等學位

註：1. Eddington是被邀請在著名哲學論壇上宣布這個似乎與世無關的數字，似乎有要“驚人”一下的打算，見[http://en.wikipedia.org/wiki/Tarner\\_Lectures](http://en.wikipedia.org/wiki/Tarner_Lectures).

## 參考書：

Edward Harrison, *Cosmology, the Science of the Universe*,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2000).

John Horgan, *The End of Science, Facing the Limits of Knowledge in the Twilight of the Scientific Age* (New York: Broadway Books, 1996).

John Leslie, *Universe* (London: Routledge, 1989).

John Barrow and Joseph Silk, *The Left Hand of Creation,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the Expanding Univers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

John Barrow and Frank Tipler, *The Anthropic Principle* (Oxford University, 1988).



# 武俠與信仰對話新篇章

## ——評介《入武林、覓真心》

黃瑞怡

基督徒該不該接觸通俗文化與大眾文學？若是基督教牧師沉醉金庸武俠小說三十年，能釀成有滋有味的新酒，吸引信徒與非信徒品嚐嗎？

武俠小說這一文類，是華人文學長流孕育的奇葩，西方幾乎難找到對等文體。西方有豐富多彩的奇幻故事，如魔戒三部曲與那亞里亞系列，也有脫胎歷史的正邪對抗傳奇，如俠盜羅賓漢，當然也不乏盪氣迴腸的羅曼史，如羅密歐與茱麗葉；但似乎沒有哪種文類，真正能與武俠平起平作。武俠小說雖說是庶民文學，背後的支撐點卻為華夏博大的士大夫和民間文化，一部上乘武俠小說，往往涵管了中國人的儒釋道精神、天文地理、史文哲學、甚至琴棋、武術、醫道、烹飪……無一不包。換句話說，雖然可能少有讀者會抱著認識文化之動機來閱讀武俠，但如果欠缺中華語言的文化背景，閱讀武俠也就咀嚼不出滋味吧！

金庸作為當代武俠創作佼佼者，其十五部長短篇作品不僅列暢銷金榜，還多次製作成影視片、廣播劇、舞台劇、漫畫、動畫乃至電腦遊戲，深入全球華人民心，對兩岸三地數代民衆影響廣遠。金庸武俠除了大眾文化娛樂功能之外，更是探討華人深層心靈需要的一座橋樑。遺憾的是，大多數華人教會牧者，對通俗文學、流行文化審慎地保持安全距離，也就無形中放棄了造橋機會。

蘇文安牧師繼去年《賞奇書，覓真我》，賞析水滸、西遊、三國、紅樓中國古典四大奇書後，今夏續推出姊妹作《入武林，覓真心》，綜覽金庸武俠作品，作出人生與信仰的聯想，並對照基督徒的世界觀與人生觀，以通俗文學和藝術與華人同胞作深入淺出的文化與心靈對話，實在值得深深喝采。

《入》篇幅精簡，但我細讀之後，覺得珠璣字句間，作者對我們有幾重光照和開啓：

### 閱讀金庸的光照

#### 1. 更深理解華人世界觀與心靈需要

金庸本人主修法史，專業上主攬香港明報多年，兼具了史家之翔實與新聞人之機敏。他的作品有如中國民俗文化百科，衆多主配角刻畫栩栩如

生，或生動呈現了華人生活裡的典形人物，或投射了讀者心中嚮往的英雄圖騰。蘇牧師精彩比方，金庸武俠是純粹「國貨」：「若非生長於中華文化氛圍、浸潤於中國語言文字的人，是絕對寫不出來或寫不道地的。恰如鴨掌、雀舌、臭豆腐……，非我族類者豈能窺其妙處耶？此即本土化的魅力所在。」正因金庸武俠深深根植在中國本土文化，閱讀金庸自然有助於更深理解華人世界觀與心靈需要。

#### 2. 聯繫武林人與天路客

金庸作品暢銷多年，讀者不知凡幾，但因背景志趣不同，也就引發出不一樣的反應與得著。蘇牧師因有數代信仰為後盾，又兼資深文字工作者的素養，因此對金庸作品的解讀，不僅僅在分析金庸作品何以成為經典，更著墨於聯繫武林人與天路客，也就是金庸作品的人生與信仰聯想。

信徒與非信徒兩邊對話，是蘇牧師全書的分享重心，涵蓋了教會觀、靈命觀、人際觀、傳承觀、整全觀、懺悔觀多個面向，每一面向都以金庸作品中角色故事為經，教會信徒實際課題為緯，或針砭或提醒，給了讀者許多思考空間和行動綱領。

#### 3. 豐富漢語語境中的信仰語彙和底蘊

基督教入華廣傳兩百年，與中華數千年歷史長河相接，還是近代的事，因此，如何將基督信仰的基本概念和語彙融入漢語語境，鬆活漢文化土壤對信仰的接納度，仍然是許多當代學者的關懷，在實際應用上，還有廣大待開拓的空間。

《入》書中，蘇牧師以創意角度，從金庸武俠中武功秘笈必然同時包含內功心法與外功招式為出發點，「引申於基督徒的生命、生活與事奉——『生命』自然是『內功』，『生活』與『事奉』則是



基督徒嘗試武俠創作，或可提供華人武俠文學從未有過的新視角、新氣象。 The Christian effort of writing Chinese Martial Arts stories may provide a brand new perspective and atmosphere to the Chinese readers in this style of literature.

招式。每日靈修、默想、祈禱和讀經，是在修練內功，追求聖靈的內住與充滿，亦是在修練內功。」信徒靈命要平衡健康地成長，就必須內外兼修。當蘇牧師討論基督徒人際觀時，以「寒月刀」和「煦陽劍」，來比照我們人際關係上對事對人不同技巧、策略的巧妙平衡。這些借用一般普羅大眾耳熟能詳的武俠概念語詞，帶出信仰實質思考，是豐富漢語語境中信仰語彙和底蘊的高明招式！

#### 4. 武俠瓶中新鮮活水訊息

《入》書末，我們讀到《神恩俠侶》這個蘇牧師由個人真實夢境改寫的武俠小品，我想「蘇大俠」若不是行走江湖多年，日有所思，夜有所牽，大概也作不出這般奇夢；然而蘇牧師出身耕耘天國地盤三代的基督徒家庭，應該也有助他在武俠的語言敘事瓶裝中，倒出新鮮的活水訊息？

《神恩俠侶》全篇最打動我的，是俠客承認自己山窮水盡，軟弱傷重，並且願意開口向「祖師爺」求助。在故事中的祖師爺既然掌管諸天萬有，顯然不屬凡塵中人，而從俠客與祖師爺對話內容，

亦可推測他們之間有一私人且親密的關係。以這樣的方式表達基督信仰，將上主與人互動的



終極關懷嵌進故事框架之中，是我往日閱讀武俠從未有過的經驗。

傳統武俠敘事，無論角色武功如何高強，打鬥如何熱鬧，情節如何曲折，愛恨如何深切，懷抱如何悲涼……重點終究在人間，或者人如何企圖憑己力超越紅塵。而基督徒寫武俠，是否能呈現出上帝話語這至善寶典，開闢靈界爭鋒這全新戰場呢？若是基督徒讀金庸武俠可以開啓與非信徒對話空間，基督徒嘗試武俠創作，或可提供華人武俠文學從未有過的新視角、新氣象。

我們且拭目以待！

### 小結

神對我們在地上的日子有美好心意，要祂的兒女成為世上的光與鹽，但若我們對每日存活的世

界、所處的特定時空，沒有真實的認識（認識不代表認同），可能就無法「正面影響世界，卻不被世界負面影響」，真正發揮光與鹽的效應。

無可否認，流行文化五湖四海中有糟粕也有醍醐，但每當一位特定作者，一套特定作品席捲市場，甚至長銷幾世代時，基督徒的態度不當是盲目排斥或被動接收，而應是正面、開放、儆醒、深思，如此，方不會被流行浪潮淹沒，也不會被世俗暴風驅趕到堡壘內，反而能嘗試在適當時機，乘在浪頭上與非信徒對話。

《入武林、覓真心》就是武俠與信仰對話的新一章，盼望還有更多新鮮有活力的新人加入，傳遞真理與愛的信息。



作者為兒童文學博士，本刊特約編輯



### 恩福靈筵—— 哥林多前書

陳宗清牧師近期完成這一本能夠幫助信徒和教會的靈修書籍，歡迎訂閱（請見索閱單）

哥林多教會是保羅第二次旅行佈道所建之的，其過程經歷不少驚濤駭浪。由於哥林多城偶像林立、道德頹廢，教會時常面對考驗。保羅離開之後，哥林多教會內部問題叢生，從分黨結派、淫亂、彼此控告、夫妻衝突、喫祭偶像之物、女人蒙頭、混亂主餐、聚會脫序、到否認復活等，實在叫保羅心憂。沒有一間教會像哥林多，令這位出類拔萃的使徒感到那麼沈重的痛苦。

當我們細讀這卷書時，可以很深體會，作者用他全部的感情與教會信徒對話，字裡行間流露出豐沛的愛。這是一封偉大、感人的書信，因為使徒不會避諱去談任何對信徒有益的話題，即使他的表達會使他們感到不悅、甚至生氣。教會應該活出聖潔的見證，保羅對這一點絕不妥協。

保羅在這卷書內提到的神學課題，不論是屬於「教會論」、「末世論」、「基督論」或「聖靈論」，都是因應當時的處境而寫，要幫助哥林多教會的信徒認清真理，討神喜悅。



## 深思又深情

劉良淑

「為這次退修會向牧師師母表示感謝，這次聚會給我的幫助和影響是最大的，特別是家人之間的那種關心和溝通，使得我和〔妻子〕再次有了心中的溫暖，和繼續走事奉道路的力量。」

2001年7月14-16日的恩福家人退修會之後，一位畢業生來信，短短幾句話，刻劃出這個聚會溫馨的主調。

### 疑結異象與關係

1994年成立的「恩福」，以「文化宣教」為事工的異象。改變文化土壤是一項任重道遠的使命，因此，1996年，董事會決定設立「恩福神學生獎金」，來長期栽培能夠從事學術交流和大眾傳媒的人才。

我們所支持的神學生就讀於不同的神學院，平時雖然有逐一的個別關懷，同工們也經常為每位神學生禱告，但是彼此的互動卻是不足。所以從2001年開始，我們一年舉辦一次退修會，以增進情誼。退修會不但要求就讀的神學生必須參加，也補助經費，鼓勵畢業生盡量前來。雖然只相聚短短的兩天兩夜，可是對於異象的鞏固和家人關係的建立，卻起到極大的作用。

退修會的安排分為兩個重點，一為靈性與觀點的提升，另一為彼此的分享。前者以專題或培靈的方式進行；後者則成為這聚會的特色。

每一位與會的人，無分學生、畢業生、董事、同工、眷屬，都有幾分鐘的分享時間，談談這一年來各人家中的狀況、生活精采片斷、和靈命的學習。無法參與的家人，也以影秀或來信的方式分享近況。

每一堂的分享常出現笑淚交加的場面。相識已久的家人，由於年年分享，對於彼此的心路歷程逐漸熟悉，所以能夠敞開內心，真實暢述，有如面對最親的家人一般。這種親密氣氛渲染了新加入的家人，使他們感到完全被接納，無拘無束，很快能夠融入。由於各人處於不同的人生階段，生活歷練迥



參加第十一屆退修會的恩福家人

異，各式各樣的話題大開各人眼界，彼此獲益；再加上精選照片的珍貴影秀，令人難忘。

會長為恩福家人退修會特別寫了「恩福家人歡聚歌」（調用「快樂頌」），經常迴盪在會場：

1. 歡欣快樂同聲頌讚，恩福家人聚一堂  
南北西東舊雨新知，相互問安喜洋洋  
天恩伴隨保護供應，路雖崎嶇心坦蕩  
訴說不盡分享不完，主名當受大稱揚
2. 人生窄路蒙主揀選，奉獻祭壇候差遣  
污穢器皿寶血潔淨，個性生命經鍛鍊  
文化宣教任重道遠，億萬靈魂肩頭擔  
以愛相繫彼此建立，同心協力不畏難
3. 神州大地福音遍傳，炎黃子孫見曙光  
學術殿堂真道闡明，基督救恩新希望  
愛在中國匯為洪流，平安美福臨萬邦  
聖靈澆灌眾心甦醒，十架榮耀大顯彰

### 對外開放新嘗試

過去幾年，退修會中都安排幾段時間，請在事奉工場上的董事與家人主講，分析該年的趨勢與對事工的影響。專題的內容相常充實，但聽眾只限於恩福家人，似乎有些可惜。今年嘗試將這部分時段開放，讓洛杉磯有興趣的主內牧長和神學生也能來聆聽。

由於是第一次試辦，雖然事先有些人傳來回應，表示想要出席，我們仍沒有把握會當天會有多少人來。感謝神，每一天的來賓有15至20位，加上

今年專題探討的總題是「時代與中國家庭教會」。  
Current Situation."

The theme of the special topics is "Chinese House Churches Facing the

30餘位恩福家人，不算太大的會場剛好夠坐。

今年專題探討的總題是「時代與中國家庭教會」，分為四個子題，由四位恩福家人主講：「從守望教會看中國政教關係」（李靈）、「時代工人的培育」（陳愛光）、「家庭教會的神學與牧養理念」（陳宗清）、「學術界的機會與挑戰」（謝文郁）。



每位講員講30分鐘，然後有兩位主要回應，各15分鐘，再給與會者20分鐘自由回應。事先講員都準備了講義，有些不僅為大綱，更是幾頁的內容。大部分講員都有影秀配合，十分生動。內容豐富，而時間有限，所以與會者多半覺得意猶未盡。

中午由我們招待午餐，約有十位左右外賓留下，一邊用餐，一邊繼續溝通。

### 豐富紮實的內容

2001年4月，北京「守望教會」由於租屋與購屋皆受阻擾，教會的帶領同工主張在戶外聚會，而因著當局防堵，引起國內外關懷中國政教關係人士的格外關注。李靈牧師以此事件為引子，釐清「政教關係」的概念，分析自古至今中國對於宗教的定位和處理模式，並展望未來的可能性和文化宣教的策略。蘇文峰牧師的回應，分析四種政教模式，以及家庭教會的期望；謝文郁教授則從經驗和所獲信息來回應，並點出守望事件問題的關鍵所在。

陳愛光牧師以多年在北美從事神學教育的心得，真誠地反思「時代工人的培育」這個重要課題，從理想的核心價值談起，深究現實與挑戰，提及科技與代溝、帶職與全職、姊妹事奉、背景與環境、師資與學制等問題；許多困境並沒有答案。蘇文峰牧師回應中特別強調，工人對神話語熟悉的絕對必要，並探討網路神學教育的優缺點與截長補短的作法。陳宗清牧師回應的講義上提供十點反思，即席則以培靈的心情強調工人靈命的不可或缺，內

室的工夫、品格的正直、夫妻的祭壇、時代的認識等。

「家庭教會的神學與牧養理念」是一個很難整理的課題，陳宗清牧師給予自己這個挑戰，發下10頁講義，分析家庭教會在各個時期所受的神學影響，以及引起爭論的議題：人論、救恩論、聖靈論、教會論、末世論、神學體系等。他花了許多時間講述背景，說明家庭教會無法按西方教派來加以區分，並特別指出家庭教會容易落入自以為是的狹隘，應以西方教會各派之間加強對話為借鏡。回應的天靈姊妹和曼德弟兄事先都有詳細準備，作了精采的影秀。

從2005年即回中國任教的謝文郁教授，從四方面談「學術界的挑戰和機會」：大學講台、學術會議、出版界、和學生的培養。這是與會者比較陌生的範疇，半個小時的說明，讓大家對於學術界的機會和影響力開了眼界。文化宣教的重要一環是改變思想，因此學術界的耕耘一向是我們所看重的；李靈牧師和陳宗清牧師從自身的深度參與，作出了回應。

### 新舊家人情誼濃

今年退修會的主題是「十字架與文化宣教」。不過，會中並沒有安排特別的培靈信息，只是在頭一晚的歡迎時間，會長再度提醒大家，無論從事哪方面的事奉，十字架總是我們的中心。週五與週六早上，家人在一起敬拜，十字架是頌讚的焦點。

每一次退修會，頭一天晚上總是安排最新的家人分享。葛浩弟兄將於今年九月開始接受獎學金，他甫自溫哥華的維真學院畢業。他介紹自己，大學時為「憤青」，到美國讀物理碩士時信主，受洗時仍蓄著長髮。回到中國後，主要在成都教書，參與教會，主持「英語角」（English corner），向青年人傳福音。後來明白神學對教會建造的重要性，並且蒙召，決心走上攻讀神學之路。

葛浩的另一半為美國人，曾在中國教英語幾年；他們有一可愛的四歲女兒。參加退修會之前，他的妻子和女兒已經回密蘇里的娘家住了兩個月，全家得以藉著這次退修會重聚，格外歡喜。

還有一位美國佳賓陪伴著天靈出席，是今年與她訂婚的神學教授。他曾在非洲作宣教士多年，後來回美，在彌賽亞大學任教，去年成為鰥夫；在神的安排與朋友的鼓勵下，兩人結識。恩福眷屬的「非華人」成員增加，使整個大家庭添加了國際風味。今年晚上分組禱告的時間，已經必須安排一組

現場出席的家人，前後共有35位。有幾位讀書和初入事奉工場的人發現，第一年適應還好，第二年卻出現很多試煉。 Thirty five Blessings Family members attended the Retreat. Several participants shared that their experiences of their second year were tougher than the first, either in seminary or in the mission field.

以英語來分享。

今年無法親身前來、以影秀參與的家人共有11位，穿插在每一堂的分享時間。這些影秀一些有影有音，一些有圖有樂，一些以字幕為主；可以看出有幾位家人對於傳媒工具的運用相當得心應手。

現場出席的家人，前後共有35位。有幾位讀書和初入事奉工場的人發現，第一年適應還好，第二年卻出現很多試煉，屢經流淚谷；有幾位在課業和實習上有豐富的領受；有些在事奉上得到出乎意外的肯定；有些在人際關係上靠著禱告得到突破，能夠珍惜相愛；有些新近晉級「祖」字輩，倍享含飴弄孫之樂；有些正處於照顧年邁父母的階段，面對體衰、疾病的信心學習；還有些人分享短宣或旅遊的心得。

一位尚就在讀的學生會後來信說：「這是我



部分與會佳賓一同合影留念

們第二次與家人聚會，相比去年，我心裡少了很多陌生感，跟家人們親近了許多。因此，我這次的個人分享非常敞開，不諱把這一年來的甜酸苦辣、真情實感跟大家傾訴。……回顧這次聚會，心中感恩的事情非常之多！……感謝駱董和師母給我們的鼓勵和幫助，聽到駱董分享他對中國基督教文字事工的負擔和展望，我十分振奮、心中大喊：“上帝真是眷顧中國！”感謝各位牧長富有啟發的報告、分享，尤其是“時代工人培育”的主題，對我這樣的後生晚輩是一個直接的提醒和鞭策！」

「真捨不得離開！」會後，一位與會的姊妹吐露心聲。的確，兩天兩夜的大團圓總嫌時間短促，然而各人有責任在身，這樣一年一度的安排並不容易。而同工們已然要開始為下一年的聚集作準備了。



作者為本刊執行編輯

## 索閱單

(請複印後填寫，寄回本刊)

稱謂  Mr.  Mrs.  Ms.  Dr.  Rev.

收件者(中文) \_\_\_\_\_

(Name) \_\_\_\_\_

(Address) \_\_\_\_\_

(City) \_\_\_\_\_ (State) \_\_\_\_\_ (Zip) \_\_\_\_\_

(Tel) \_\_\_\_\_ (Fax) \_\_\_\_\_

(e-mail) \_\_\_\_\_

以下項目歡迎索閱，並自由奉獻。請酌增郵費。

### 雜誌/期刊

恩福雜誌從第\_\_\_\_期開始(一年四期成本約15美元)

《基督教與中國》第一輯 \_\_\_\_本(建議奉獻8元)

《基督教與中國》第四輯 \_\_\_\_本(建議奉獻8元)

《基督教與中國》第五輯 \_\_\_\_本(建議奉獻8元)

《基督教與中國》第六輯 \_\_\_\_本(建議奉獻8元)

### 書籍

《生命的U-Turn》(繁) \_\_\_\_本(建議奉獻10元)

《生命的U-Turn》(簡) \_\_\_\_本(建議奉獻10元)

《中西文化精神與未來走向》\_\_\_\_本(建議奉獻25元)

《中國現代化視野下的教會與社會》\_\_\_\_本  
(建議奉獻20元)

《恩福靈筵—馬太福音》\_\_\_\_本(建議奉獻12元)

《恩福靈筵—使徒行傳》\_\_\_\_本(建議奉獻10元)

《恩福靈筵—羅馬書》\_\_\_\_本(建議奉獻8元)

《恩福靈筵—啟示錄》\_\_\_\_本(建議奉獻10元)

《恩福靈筵—哥林多前書》\_\_\_\_本(建議奉獻9元)

《尋夢者》\_\_\_\_本(建議奉獻13元)

《生命織錦圖》\_\_\_\_本(建議奉獻10元)

《聖經遇見小故事》\_\_\_\_本(建議奉獻10元)

### 影音產品

恩福佈道培訓息系列(1) DVD \_\_\_\_套(建議奉獻45元)

恩福佈道培訓息系列(1) CD \_\_\_\_套(建議奉獻15元)

恩福佈道培訓息系列(2) DVD \_\_\_\_套(建議奉獻45元)

恩福佈道培訓息系列(2) CD \_\_\_\_套(建議奉獻15元)

奉獻支票請寫：BCMF

請寄至：701 S. Atlantic Blvd., Suite 268B,

Monterey Park, CA 91754, U.S.A.



# 學術界的挑戰 和機會

謝文郁

中國人文學科的學術界是一個很寬泛的領域，主要存在於各大學和各省的社會科學研究院，人員組成為大學教授和研究人員。中國學術界是中國思想界的主體。本文從我在其中的參與經驗，談談我對中國學術界的認識。

## 一、大學講台

在中國古代文化中，讀書是讀聖賢之書，因而讀書人應當知道如何為人處事，可以教別化人，為人楷模。因此，讀書人是備受尊敬的。不過，隨著現代西方學術的引進，讀書人分為兩類，一類是科學技術方面的教育和培訓，目的是造就高級工人，包括理科、工科、醫科等理工類。他們並不追究如何為人處事，只是在掌握相應知識之後，便可以從事一些高級的技術工作。然而，由於這些人在大學讀書、教書，所以在中國社會中也被認為是懂得為人處事的人，民衆還是期望他們能夠為人楷模，儘管這對他們來說是額外的要求。

另一類人屬於人文學科範疇，主要涉及哲學、文學、歷史等等。這些人的研究，目的是要給社會提供思想。他們需要讀古代聖人著作，追蹤當代各種思想，為社會設立規範，為人楷模。他們雖然受到理科、醫學、工程等學科的影響，往往把自己降

格為一個職業學習者或職業家，推卸他們作為社會教化和為人楷模的責任；但是，除了學校，中國社會再無其他地方可以提供人生價值方面的研究和教育，因此，他們無法推卸這一社會責任。

在此將中國和西方作一比較。西方社會將學校很簡單地定位為教授知識的地方，並不提供價值方面的教育。因此，美國的大學強調學術至上，允許不同的價值觀念共存。西方社會的價值傳承在教會裡。但是在中國，並沒有類似西方社會中“教會”這樣的基層單位，可以培養道德和價值觀。中國的大學教授（特別是文科教授）不但擔負教授知識的責任，還被賦予了以身作則、為人師表的道德要求。由此觀之，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特別需要一大批基督徒站上大學講台，引導學生的道德行為。

從傳授知識的角度看，對於許多歷史、哲學、文學等文科課程來說，具有基督信仰背景與無此背景的學者，在安排課程和講授重點上皆有極大的差別，對學生的影響也極不相同。

中國政府目前在學術上採取開放政策，只要不涉足政治，並且遵守學術原則，教授們基本上是可以自由開設課程和講授。因此，培養並支持基督徒學者到大學任教，對於福音傳播是極為重要的。

我想通過我在山東大學的教學經驗來說明這一

任何一位基督徒學者要在學術界作見證，就必須在相關領域有深入的研究，握有較大的話語權，在這基礎上才能和各界學者進行學術和思想上的平等交流。 If a Christian scholar desires to voice his opinions in academia in a way that he may be treated fairly by other scholars, he must have in-depth study in the related field with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點。我開設了一些宗教學和哲學方面的課程。以宗教哲學為例，我在設計這門課時，以問題為中心線索，如宇宙起源問題、人生的生前死後問題、人生意義、超越性存在對生存的作用、如何談論超越性存在、宗教比較、善的問題等等，並從基督教和儒家對這些問題的處理方式，作為整個課程的內容。又如，在西方哲學史這門課程中，我特別把約翰福音安排為一次內容，介紹基督教對希臘哲學困境的一系列回答，並追蹤基督教在西方思想史的槓桿性作用。我每年給博士生開設一門讀書課，今年開設了奧古斯丁的《論原罪和恩典》。這類課程通常有一大批旁聽生，可以深深影響學生們對基督教的看法。

## 二、學術會議

對於學者來說，學術會議乃是一個以文交友的場所。學者在會場上交流各自關心的問題和主導性思想觀念，瞭解對方目前所進行的研究主題，並在直接接觸中感染對方的思想品格和個人情操，以此建立私人關係，為以後的學術來往建立橋樑，打下基礎。因此，學術會議的主調是“文”和“友”。

學術會議通過主題，吸引興趣相近的學者參加。與會學者的學術背景可能完全不同，然而就我自己的經驗而言，不同背景的學者共濟一堂，談論共同的問題，往往更能夠開闊視野，拓展研究的空間。

我想從兩個角度談談“文”。首先是學者的共同興趣。上個世紀90年代，中國學術界興起了一股基督教熱，有關基督教的話題一時十分熱門。學者們從各種不同的角度討論基督教，對基督教的理解也不見得正確，但是，這股思潮對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還是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有幾個標誌性事件值得一提。劉小楓1998年加盟香港道風山後，組織國內學者大規模地翻譯介紹基督教文獻和思想（最近幾年，他的興趣轉到古典研究。）“北美基督教學會”在1996-2005年間，舉辦了十次有關基督教與中國文化方面的學術會議，頗具規模，曾經是中國學術界的興奮點。從2000至2010年，“維真學院中國研究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宗教所合辦了十次有關基督宗教的會議（最近宣佈將暫停）。

儘管進入本世紀之後，這股思潮的熱度已有所回落，但是它對中國思想界的衝擊是巨大的。過去那種對基督教無知的談論方式，已經基本消失了。實際上，我們需要推進這個思潮，應當採取不同的

方式繼續推動，擴大中國學術界對基督教研究的興趣和深度。

其次是學者交流。一般來說，學者必須對某個主題有深入的研究，才能夠擁有相關領域的話語權。學者之間的交流並不是平等的。倘若學術水準沒有達到相應的高度，就無法作為平等的對話者而受到尊重，只能作為受教者。因此，任何一位基督徒學者要在學術界作見證，就必須在相關領域有深入的研究，握有較大的話語權，在這基礎上才能和各界學者進行學術和思想上的平等交流。

這些年來，我在國內每年都要參加三次以上的學術會議。在和國內學者的交流中，通常會遇到這幾種情況：如果對方執著學術追求，對基督教持友好或中立態度，我們通常能夠建立起君子之交，並在學術上保持一定的聯繫。如果對方對基督教持輕視甚至敵視態度，我們也能夠做到至少相互尊重，並繼續尋找共同話題切磋討論。實際上，有許多朋友關係是在這些會議上交接的。

今年5月28-30日，我參加了北京師範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舉辦的“科學與信仰”會議。會前我想只是來聽聽，見見朋友。但是，在會上發現有幾位講員在涉及信仰和基督教時，做了一些相當不到位的評論，因而在會議結束前要求發言。在題為“恩典概念的認識論意義”的演講中，我對其他幾位演講者進行了深入的回應。有位在場的基督徒對我說，我的演講就像一場學術佈道。這些回應對他們的思想衝擊是內在的、深刻的，以至於在會後的酒桌上彼此有更多的話題和討論。這種學術上的衝突往往能夠激發對方的思想熱情，進而建立私人感情，疏通進一步思想交流的通道。

今年6月6-8日，我和幾位儒學—儒教的熱心提倡者，在尼山聖源書院進行一場題為“何為中華心”的會議，其中有一位學者經常公開反對基督教在中國傳播。我反復強調自己的兩重身份：基督徒和中國人，並和他們分享這兩重身份在我的思想和生存中所形成的積極張力。諸如此類的會議，一方面提供了學術層面的思想碰撞，另一方面則增進了學者之間的私人感情，並在此基礎上繼續進行思想交鋒。

我們需要更多的基督徒學者參加這類學術會議，和與會者進行深入的互動。以學術為基礎，通過建立私人感情，進而進行思想交流，讓其他學者心平氣和，帶著尊重的心態來理解我們的信仰和思想。這在我心目中，乃是在學術界道成肉身、為神作見證。

長遠來看，如果基督徒不進入大學的研究生培養領域，就無法在中國思想界掌握話語權。  
If we Christians do not have access to influence graduate students, we would not be able to obtain a leading position to direct the intellectual discourse in China.

### 三、出版界

劉小楓在過去十餘年曾在學術界組織翻譯了大量的基督教文獻。這些文獻並不一定是福音派所認可的，但無可否認，這些譯作大大推動了中國學術界對基督教的重視，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基督教的學術。

目前中國有關基督教的論著，仍然處於翻譯介紹的階段，對中國學術發展方向雖有影響，但十分有限。我認為，需要有一批基督徒學者，寫出建立在基督信仰基礎上、有分量的論著。總之一句話，我們必須透過出版，在中國學術界製造經典文本。

有份量的著作應該有幾項特徵。首先，它和當代中國社會的思想脈搏一起跳動。也就是說，它對中國社會的思想問題應有深入的體會，並予以直接的回應。問題意識是會發生共鳴的。只有切中問題，才能在思想界引發共鳴。

其次，它能夠從基督信仰出發，對這些問題進行回應。實際上，對於同樣的問題，人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進行回應。比如，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在西方思想界的影響下，形成了一股強大的自由主義思潮。這些學者有相當深刻的問題意識，並從自由主義的角度加以回應，在中國思想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因此，如何從基督信仰出發來回應問題，乃是基督徒學者的重任。

第三，在學術上它必須能經得起各個角度的批評。

我2005年受感動回中國教書，重返中國學術界。當時，神明確地告訴我，我必須回到國內進行寫作。這些年來，我對這一點的體會不斷加深，由衷讚美神的帶領之偉大。只有在國內，我才能切身感受當代中國思想界的問題，使自己的問題意識與之融為一體。

值得一提的是，我從2001年開始寫《約翰福音注釋》，到2006年時大約完成了30萬言；原想在當年出版，但是出版計畫一再推遲。直到今年春天才最後定稿，達50萬言。其中有一重要的關鍵，便是過去幾年我的問題意識不斷改變、深化，寫作具有更明確的針對性。一些學界專家（非基督徒）審閱本書的初稿後，認為它是古典研究的典範，深信它必將對中國學術界和思想界發生重要影響。同時，過去幾年我在北美華神教授約翰福音，也使用這注釋本，因著和信徒深入互動，使我在措辭和表達上進一步完善，讓內容能夠為教會同工接受。十年之

功，一直有神的帶領。我深信，神會大大使用這個注釋本。

### 四、學生培養

目前，中國思想界擁有話語權的人，主要是各名牌大學的研究生院與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的畢業生。他們分佈在大學、政界、媒體等領域。基督徒要在中國思想界擁有發言權，必須走大學／研究生院的道路，即，必須經過嚴格的學術訓練，奠定學術基礎，然後才能在思想界發言。



謝文郁在退修會中發言

中國各大學研究生院的培養標準，是由教育部統一規定的。各大學的教師隊伍參差不一，因而畢業生的品質也不盡相同。當然，研究生培養還涉及政府的扶持和資助問題。但是，歸根究底，在研究生的培養上，導師還是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長遠來看，如果基督徒不進入大學的研究生培養領域，就無法在中國思想界掌握話語權。我們必須從現在做起。不過，這件事確實涉及面太廣，如研究生導師隊伍的形成，研究生個人的靈性生活，教會和團契的存在等等。這項工程不是一兩個人或組織能夠完成的。然而關鍵在於，我們必須充分認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

在此分享我在這方面的一些努力。2005年我決定回國時，神對我說過，除了寫作出版和講台會議的參與，我要培養一批具有紮實學術功底的基督徒思想家。我當時還在納悶，中國研究生招生有一套嚴格的選拔標準，我去哪裡找基督徒學生？幾年過去了，神把學生賜給了我。我的博士生當中，有些進來時就是基督徒，有些不是，但一兩年之後也受洗歸主。我在國內的身份是教授－學者，不便公開勸人信耶穌。但是，我表明自己的基督徒身份，因而我的為人處事方式會直接影響學生。受洗的基督徒學生，一般都有固定的教會生活。我在培養學生的時候，要求他們立足國內，紮實作學問，寫文章，儘早在國內學術界展露頭角，奠定學術地位。我相信，神一定會大大使用他們。

作者為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教授，也在中國重點大學任教，本文為在恩福家人退修會分享的內容





# 從憤世到獻身

葛浩

**我**出生在江蘇省一個離海不遠的小村莊，在那裡度過了快樂的童年。父母很重視教育，從小送我去最好的學校。在高考中，我在班級總分名列第一，因而能在1995年進入復旦大學物理系。然而，大學生活遠非我所憧憬的那樣美好；不久我便對科學失去興趣，陷入失落和困惑。我開始思考生命的意義，在文學和哲學裡飢渴地尋找，但始終沒有找到安身立命的答案。畢業之際，我感到很迷茫，對社會和他人充滿憤怒，不知該如何度過這一生。我開始申請美國的大學，希望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經歷新鮮的事物。

## 找到安身立命之所

2001年夏天，University of Toledo 的一份全額獎學金將我帶到了美國。在全然陌生的環境裡，首先向我伸出友愛之手的，是一群華人基督徒。剛下飛機，他們就找到我，帶我去教會的迎新會和查經班。

之後，他們總是真誠地關懷我：打電話問候我，送傢俱給我，開車帶我去買菜。在中國，我從來沒有遇見過這樣的一群人，因為一般情況下，如

果有人幫助你，他一定是有所企圖，但在這些基督徒身上，我似乎看不到任何“企圖”。他們對我的關心是真誠而無私的。從他們身上，我發現了一種新的生命特質；他們的喜樂、平安和愛深深吸引了我。我後來發現，他們當中許多人其實像我一樣，曾經都是中國留學生，也經歷過迷茫與掙扎。這給了我很大的震撼。我想，如果一種信仰能如此巨大地改變人的生命，那麼這信仰必定有十分強大的力量，值得深入研究。

於是我決定每週五都去查經，一年多的時間裡，我一直和他們研讀聖經，並探討人生和世界的問題。與此同時，神讓我經歷一些痛苦的事情，迫使我更深入反思生命的意義和本質。此前，我一直相信自己的心靈是高貴而良善的；這是支撐我一切傲慢和清高的基礎。但當我剖析自己靈魂的時候，我發現自己的內心並非我所想像的那樣高貴而良善；相反，我看見了巨大的黑暗和自私。那一刻，我內心的驕傲一下子土崩瓦解；我覺得腳下的地開始塌陷，自己正在滑向無底深淵。像溺水的人試圖抓住稻草一樣，我在絕望的邊緣揮舞著雙手，向上帝呼救。

2003年2月11日，我決志信主。我終於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和人生的港灣，心靈獲得了安慰和安息。

## 高過我的意念

我在查經班認識了我現在的妻子Tara。她當時準備去中國教英語，因此來華人教會學習漢語。六個月之後，Tara便去了中國，在山東聊城大學教書。2003年底，我完成碩士論文，也回中國，希望在聊城找到一份工作，以便和Tara 在一起。然而，神卻對我另有安排。我很努力地找工作，但一直沒有結果。更糟糕的是，為了專心教書，Tara 決定和我分手。

我帶著一顆傷痛的心，離開聊城，再次踏上孤獨而迷茫的旅程。然而不久，一個出乎意料的機會



2007年夏天，我在上帝面前立下誓言，要將餘生獻給以傳福音和護教方式擴張神國的事業。

In the summer of 2007 I pledged before God that I would dedicate the rest of my life to the enterprise of expanding God's kingdom by evangelism and defending the Christian faith.

來臨了：我在成都國際學校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上帝的意念高過我的意念，祂帶我去成都，在那裡讓我的福杯滿溢。

經歷兩年的分離之後，Tara和我重新和好；我們在2005年底走到一起。結婚時，我們在成都買了一套公寓，擁有了自己的家。一年之後，女兒Nolene出生。在這麼短的時間裡，上帝就賜給我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雖然離開聊城時我悲傷愁苦，但神的意思是好的；祂讓我學習尋求祂的旨意，並向我展現祂豐盛的慈愛和恩典。

成都國際學校的基督徒氛圍對我也是極大的祝福。我剛進去時，是一個新信徒，還帶著許多疑問。在一群虔誠基督徒中間工作相處，不僅使我的信仰得到堅固，而且使我的靈命快速成長。在同事的介紹下，我參與了一個家庭教會的服事，成為福音同工，去英語角向大學生傳福音，並有機會帶領一支隊伍去四川西部短宣。這些經歷讓我越來越清楚自己的使命：向中國大學生和知識分子傳福音。

神也改變了我對神學的看法。此前，受家庭教會的反智主義影響，我對神學一直都心存偏見和排斥。2006年，一個同事推薦我上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 的中文神學證書課程，我有些遲疑。在他和Tara的積極鼓勵下，我勉強答應一試。然而，學完兩門課之後，我對神學有了全新的認識，看出反智主義的淺陋和危害，明白了神學對福音傳播的關鍵作用和意義。一方面，我看到一些神學瓶頸轄制了中國基督徒，使他們不能更深更廣地影響中國的社會與文化；另一方面，我意識到，要更有效地向中國知識分子傳福音，必須更深入地反思福音在中國文化處境裡的意義。為回應這些挑戰，我決定全時間學神學。

## 出乎意料的恩典

2008年夏天，我來到維真學院，開始了基督教研究碩士的學習。選擇維真，不僅是因它的課程結合了信仰和學術，更因它有中國學者項目，讓我有機會接觸來自中國的博士生，向他們傳福音，和他們建立關係，為我將來回中國大學教書打下基礎。

回想在維真的三年，我心裡滿有感恩。我不僅在神學思考上有所突破，而且和家人一起經歷了神的信實，並學習時刻依賴和仰望祂。在眾多經歷中，有兩件事情特別顯示神的奇異恩典。

來維真之前，我向朋友諮詢讀神學的費用情況；這位朋友來自非洲，曾在新加坡三一神學院獲得道學碩士。他給我的建議是：如果獲得學費獎學金，就憑信心去；不要擔心生活費，如果是神讓你去讀神學，祂必定會供應。我聽取了他的忠告。在獲得維真的學費獎學金之後，就憑著信心，帶了幾千美元，將一家人帶到溫哥華。然而，很快我們的存款就所剩無幾，獎學金的申請卻失敗，我們似乎走到了絕境。就在這時，我實習的教會突然宣佈，將每月的資助增加到兩倍多，一下子就解決了我們的困境！在這件事上，我們切切實實經歷了神的信實和出人意料的恩典。

維真學業即將結束時，我讓妻女提前離開溫哥華，住在岳父密西根州的家，以節省房租，並讓我專心完成論文。我當時已被劍橋大學錄取，計劃盡快寫完論文，辦好去英國的手續，就和家人團聚。然而，事情的進展不如預想。寫完論文時，我們一家分離已兩個多月，還有許多要做的事情，我真不知道何時才能和她們團聚。就在惆悵的時候，我突然收到了恩福基金會邀請我們全家參加退修會的通知！於是，分離兩個半月之後，我們一家終於在洛杉磯相聚了！神的恩典還不止於此。我原計劃退修會一結束就回到溫哥華，但一位朋友建議我去密西根和家人多住一段時間，並願意為我買往返的機票。神的眷顧何等細緻奇妙！

面對如此浩大的恩典，我唯一的回報，就是將自己一生交給主，讓祂使用。2007年夏天，我在上帝面前立下誓言，要將餘生獻給以傳福音和護教方式擴張神國的事業。我計劃在未來三、四年內獲得劍橋大學的神哲學博士學位，然後回國任教，向大學生和知識分子傳福音，並努力使基督教對中國的社會和文化產生更廣更深的影響。

願神的旨意成就！

作者為恩福神學生，就讀劍橋大學



2011年9月12-16日，兩千餘位來自各地的代表，齊聚印尼著名觀光景點峇里島，參加第八屆世界華人福音會議，探討宣教課題，增進主內情誼。大會主題「基督整全福音臨萬民」，強調：「福」來自「基督」——因為祂是賜予我們生命的主；「福音」便是這「福」的消息；而這「福」是「整全」的——不僅關乎個人今生來世的命運，也擴及社會群體、生態環境，因為蒙福的人可以將神的祝福延伸到四圍；最後，這「福」必定要普及列邦列族，臨到「萬民」。

「基督整全福音臨萬民」，這件美事不是一廂情願的理想，而是有根有據的。大會邀請萊特博士(Christopher J. H. Wright)擔任主題查經講員，這位儼然為斯托德牧師接班人的舊約學者，從神給亞伯拉罕的應許——地上的萬國都必因他得福——出發，以紮實嚴謹的解經，讓眾人清楚看見，創世之主在歷世歷代中從未改變心意。祂拯救亞伯拉罕肉身的後裔以色列族，脫離埃及的奴役，囑咐他們遵行神道，以致能成為興旺之邦，昭示萬國當歸向神。以色列國墮落之後，神將他們拋在列國中加以管教，卻囑咐他們為所在的邦國祈福，顯示祂要讓萬國得福的目標始終如一。當時候滿足，神藉耶穌基督的死與復活實現救恩，拯救亞伯拉罕屬靈的後裔——教會，並吩咐他們宣揚福音，直到地極，實現讓萬國得福的目標。所以，教會所詳熟的「大使命」，其實不是一項新的宣教使命，而是神從起初就定下的心意。換言之，這是神自己的使命，自始至終不變；而每個世代中神的子民都必須與祂配合，來完成這使命。

這個「讓萬人得福」的故事，就是聖經所述說的「大故事」：從當前的天地說起，直講到新天新地，整個故事有頭有尾、高潮迭起、邏輯分明。相較之下，其他宗教、哲思所提供的宇宙人類「大故事」，破綻瑕疵累累，無一能與之相媲美。倘若有人隨從後現代的潮流，否定所有「大故事」，他就會像斷了線的風箏，活在虛無中，沒有定向，至終極可能因毫無希望與目標而失去生存動力。反之，一旦接受聖經的「大故事」，我們便可以給自己的「小故事」畫出清楚而美好的輪廓，肯定人生努力的方向，成為積極播撒「福種」的人。

神的一貫心意，是要將祂的「福」臨到人間，澤及宇宙。祂正在進行這使命。這個聖經根據，是教會從事宣教的理由。教會不是信徒互惠的社團；傳福音不是教會活動的選項；作門徒不是特殊屬靈人士的追求；社會關懷不是可有可無的事工；普世宣教不是大教會才要關注的課題。每一個屬神的兒女都要與天父攜手，在祂的使命上同心同工，使世人得福。無怪有人用「延福」來作「宣教」的別

名。

不少與會者表示，從「神要使萬國得福」的視角來看宣教，是他們在這次大會中最寶貴的收穫。由此再反思研討會的課題：「以聖潔的生命來事奉」、「跟隨基督榮耀的腳蹤」，熟稔的話題有了新的亮點。「如何面對『去基督教』文化潮流中的宣教困境」的探討，激發與會者不畏環境的壓力，因為在人不能，在神卻凡事都能。「教會合一」是普世信徒最有力、最重要的見證，縱有教義、派別、文化、組織種種差異，但在宣教上總要盡力互相扶持。

兩天下午的工作坊，匯聚了全球華人的宣教菁英，分享各種宣教方式的心得，總共有40個專題。三天晚上除了講道外，還邀請來自創啟地區、非洲、東南亞的宣教士作見證，三位牧者在異文化中都有十餘年以上經驗，顯示在「福音入華」兩百多年後，華人教會已經離開只是領受福祉的幼兒期，確實邁入了「福音出華」的階段。

「福」，誰能有效地延伸？其實，只要有心與神聯手，必見佳績。以下是在大會中聽到的兩個例子。

新加坡有間教會認真宣教多年，主任牧師帶頭作宣教士；在建堂時，每一樓層用各大洲命名，每一間教室用宣教地區的國家命名；不但舉辦宣教年會，更注重精采的兒童宣教營。如今這單一堂會已支持66位宣教士，其中有十餘位是本堂的肢體。

香港有個以推動禱告來參與宣教的機構，要在全球尋找六千萬代禱勇士，每天用半小時禱告；他們經常在報上刊登廣告，教導信徒怎樣為世上的需要祈求；他們製作各式各樣的禱告手冊，指教人如何為人生大小事禱告；他們常為本地和世界遭災的人祈禱，並且懇求神引導，用實際又有效的方式來提供幫助；神讓他們進入媒體影響社會，又有力量跨洲伸援，讓人吃驚又感動的見證不勝枚舉。

還聽到好幾則「小故事」。原本生命一團糟、家庭亮紅燈的人，因著回轉歸神，願意全心順服，人生便急轉彎，經歷一個又一個「出乎意料」，結果發現，「福」就像漣漪一般，不斷從自身向外擴散。

神是樂意賜福的造物主，祂正在尋找可以施福的器皿。深願「得福、蒙福、傳福、延福」的人加速倍增，形成洪流，漫溢全地。



# 恩福

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701 S. Atlantic Blvd., Suite 268B  
Monterey Park, CA 91754  
U.S.A.  
地址變更，請即通知本刊，謝謝！

NON-PROFIT ORG.  
U.S. POSTAGE  
PAID  
MONTEREY PARK  
CA  
PERMIT NO.70

## 福啊，延伸！

蘇卿

傍晚，微暗，海風徐徐，輕音樂漫漫，椰枝雅舞，花樹送香，一抹白浪拍堤。峇里島，旅遊夢幻地。

手牽手，漫步在如詩如畫的太平洋邊岸，心靈徜徉，寧靜。這般陶然情境，似是幸福環繞，不禁讓人聯想：什麼是福？

當嘴角泛起微笑，當胸口湧起暖流，當淚水伴著歡欣，當有人呵護擁抱，當全人放鬆安睡……我們知道自己在福中。

「福」從何而來？這問題或許比「宇宙從何而來」對我們更重要，但最聰敏的科學家亦無法回答。然而每個嬰兒呱呱墜地，被慈母緊緊抱在懷中，就隱然明白：「福」源於生命賜予者無條件的愛。

(轉封底裡)